

時論叢刊之一

上海中華時報言論集

第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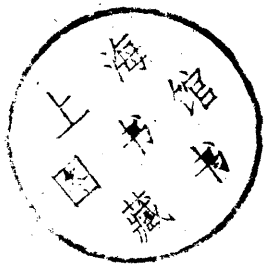
中流出版社印行

上海中華時報言論集

時論叢刊之一

上海中華時報言論集

第一輯



中國出版社印行

~~1610842~~

上海圖書館藏

時論叢刊之一

上海中華時報言論集

第一輯

編輯者 中流出版社

發行人 常燕生

發行所 中流出版社

上海愚園路六六八弄九六號

每冊實售國幣

元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出版

目 錄

中國不堪再內戰了.....	一
對各地青年朋友們一個總答覆.....	四
評民盟最近主張.....	七
發揮協調的精神.....	九
對國事要樂觀.....	一
告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們.....	一
兩重統治下的人民.....	三
貢獻給毛澤東先生.....	五
中立與公平.....	六
——請教羅隆基博士——	九
「軍隊國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正確意義.....	二二
論中美邦交.....	二二
自由主義者聯合起來.....	二四
——擁護「白魯塞爾宣言」——	二六
建國必先整軍.....	二八
——我們歡迎美國援華整軍——	二八
勿以內爭牽涉外交.....	三一

心理上的距離.....	三二一
誰在鼓勵中國內戰.....	三三三
——並敬告莫斯科真理報——	
整軍應當祇是一個技術問題.....	三五五
自由經濟與平抑物價.....	三七七
新聞自由與民主和平.....	三九九
勿用青年作工具.....	四二二
再論美國援華政策.....	四四四
——並答「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	
國大召開的再決定.....	四七七
完成建國大業不能一日無理想.....	四九九
——抗戰建國九週年紀念日感言——	
客觀的中國國際地位.....	五二二
一切官辦，官辦不了.....	五四四
邱吉爾演說與法國的歧路.....	五六六
望政府貫徹保護人民的通令.....	五八八
荷印獨立展望.....	六〇〇
勉抑意氣，相忍爲國.....	六二二
正視強權政治時代.....	六四四
值得注意的兩件事.....	

團結，復興……	六九
——巴黎和會前夕中國應有的努力——	
應從尊重人民做起……	七一
祝巴黎和會成功……	七三
公是與公非……	七六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96788

中國不堪再內戰了 五月十九日

內戰足以毀滅一切，中國不堪再度內戰了！

然而不幸得很，近二十年來，以國共兩黨的互不相下，竟長期陷於內戰之中，迄今猶不能停止。抗戰以前的十年內戰，除增加人民的痛苦，引起嚴重的國難以外，國共雙方皆無所得。在八年多的抗戰期中，國共雙方雖大致趨於一種暫時對內休戰狀態，但相互戒心和局部衝突並未完全消除。及抗戰勝利，國共兩黨又有再度內戰的危機。幸因全國人民的責望和美國朋友的調解，曾於一月十日正式宣布停戰。接着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一致通過五項決議，並由軍事三人小組商定整軍方案，以求逐漸完成和平團結民主統一，舉國以及舉世莫不為之慶幸。不料政協決議與整軍方案未及實行，即因東北問題引起軍事衝突。衝突到現在，已由東北擴大到關內，如任其繼續衝突下去，其勢非毀滅整個國家與全體人民不止。我們為國家前途計，為人民幸福計，不得不對於國共雙方要求迅速停止內戰，竭誠從事協商。

這次內戰之所以再起，國共雙方皆將其責任推在對方。但從三者看來，國民黨應負一部分的責任，共產黨亦應負一部分的責任。國民黨所應負的責任，在不應提議修改政協決議，使共產黨有所藉口。共產黨所應負的責任，在不應依賴國際援助，武力奪取東北，使政府無從接收，而政府已接收的地方，如長春等也不能和平保有。政府為重行接收長春等地，不得不調兵遣將遠赴東北作戰。中共為保持既得的東北地盤，亦不得不在關內攻城略地，以牽制政府，策應東北。有人以為政府軍在東北失敗以後，必在關內發動攻勢，以圖報復。但我們以為在東北衝突尚未分大勝負以前，中共軍必在關內發動攻勢，以圖牽制。最近中共軍在蘇北，山東，河北等地的動態，即足證明全面內戰的危機已十分

嚴重了。現在國共雙方的軍隊，已如箭在弦上，不能不發了！我們要號召全國人民一致警告：國共雙方，立即停止內戰，恢復和平，使全國人民得於長期抗戰以後，稍事休養生息。

有人說：一切熱心從事內戰者，只知有武力，只知以武力奪取政權或保持政權，那知人民的死活和國家的安危。國民黨的心理，固大體不外如此，而共產黨的心理，也大體不外如此。毛澤東氏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曾說過「沒有武力，便沒有一切」的話，便是一個確證。不過我們不願如此推測國共雙方對於內戰的心理；即令果真如此，也未必於國共有益，試分別加以說明。

先就國民黨說：國民黨內也許有人懲於過去對於共產黨的經驗，不願再與共產黨合作，堅決主張武力解決。這是內戰的一個因素。我們對於這個因素，暫不批評。但我們要問國民黨究竟武力能不能解決共產黨？在抗戰以前，政府曾用武力圍剿江西的共產黨十年，無法肅清，結果造成西安事變，歸於暫時休戰。現在共產黨經過抗戰以來的發展，論其實力，已五十倍於抗戰以前，論其地盤亦五十倍於抗戰以前，東北以及華北各省已大部分在共產黨武力控制之下，國際路線業經打通，可以源源得到接濟，如政府要以孤軍遠赴東北與共軍爭勝負，實在難有勝算。縱在東北有暫時的勝算，而關內也難保無意外的威脅。華北各省且不必說，即逼近首都的江北亦不免時時感受威脅。一時一地的勝算，決不能認為是最後的全盤勝算。從前圍剿十年尚無辦法，現在豈能在短期內以武力消滅共產黨呢？如果迷信武力解決，勢必釀成二度長期內戰。在長期內戰中，久苦於抗戰的軍隊，能否保其始終效命，而不生意外呢？萬一有了意外，如何結局呢？又在長期內戰中，久苦於抗戰的人民，能否保其一致贊同而不生變故呢？萬一國民經濟因長期內戰而陷於破產，致激起民變，又如何下場呢？又在長期內戰中，國際地位必一落萬丈，國際援助必忽告停止，國家財政又如何支持呢？萬一國家財政因長期內戰而陷於破產，致激起「官變」，又如何收拾呢？凡迷信武力解決的人們，對於以上各種問題，需要作一個深長的考慮。如其逞意氣，好痛快，難免誤國自毀。古人說得好，「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我

們不願親見國民黨以兵自焚，希望其從速戡兵！蔣主席是國民黨的總裁，當更不願親見國民黨爲內戰所毀滅，所以會有「政治解決」的正確宣示。我們希望全國各方都依照蔣主席的這個宣示，解決國內一切問題，以免互毀自毀。

再就共產黨說：共產黨內也許有人堅信其現有的勢力，已可與國民黨抗衡，不妨一面以武力方法奪取地盤，一面以政治方法僵化政府。於是邊談邊打，無往不利。不到數月，已大有所得，再經數年，即不難取國民黨而代之。我們假定這種想法有幾分實現的可能，但決不是很輕易的有實現的可能。其所以不能輕易實現的重要原因有以下幾種：第一因中國太大，決不能出一黨武力統治全國。國民黨經過二十餘年的努力，尙不能以其一黨的武力統治全國，共產黨也不能以其一黨的武力統治全國。第二因中國民族性不大適於共產黨的作法。共產黨的作法多是極端的突變的，而中國民族性則是中庸的調和的，兩不相容。近年共產黨雖在國民黨勢力範圍內倡言民主自由，但在共產黨勢力範圍內則未必真有民主自由。例如江北人民因受共產黨壓迫而被害被捕被逐者日益增多，即是一個百口莫辯的事實。第三因國民黨的軍隊多曾經防共的訓練，決不易在短期內全部被摧毀。第四因共產黨有國際背景容易引起國際問題，甚至引起國際戰爭。現在共產黨已擁有東北及華北的大部分，如再進一步發展，即難保不發生國際問題。從前國民黨北伐發展到華北及東北以後，即引起九一八事變，便是一個殷鑑。萬一國內戰爭發展成爲國際戰爭，整個中國有被犧牲的危險，共產黨亦無最後成功的可能了。

總之，內戰足以毀滅一切，即國共雙方亦均將難免爲內戰所毀滅。國共縱不爲國家與人民設想，也應爲自己設想。要善於爲自己設想，便立即停止軍事衝突，重行從事政治協商！

對各地青年朋友們一個總答覆

五月二十日

最近從四面八方收到不少青年們的來信，提出種種問題，一一在報紙上公開發表，爲篇幅所不許；逐一答覆，又爲時間所不可能；無已，我們只好來作一次總的回答。

各地來信的內容，最主要的大抵不外四個方面：

一、對時局前途悲觀或者憤慨，希望我們加以分析和推測。

二、青年們自身發生了求學與就業的問題，很客氣的要求我們加以指導。

三、另一部分對政治很熱心，希望參加黨派活動，問我們以加入什麼黨爲最妥當？寫信給我們，自然有一部分就直截了當表示願加入青年黨，有的甚至願意整批整批的加入，問我們的態度怎樣？

四、生活不了，這是來信的人所一致強調的，問我們，長此演變下去，有無好轉的可能？

這四個問題都很複雜，我們深知道我們的答案決無法使大家滿意，我們只能表示一些看法，談不上解決問題。

首先談第一個問題：時局前途誠然是相當黯淡，但是悲觀無用，憤慨更無用，過度的憤慨與悲觀，不僅於時局絲毫無益，甚至反而毀滅了自己！目前最要緊的是對這個緊張的局勢要加以理解。你們以爲時局之所以演變到今天的現狀，只是一種偶然嗎？在我們稍稍知道抗戰前與抗戰中種種經過的人，却認爲決不是偶然而只是當然。抗戰一經開始，我們即認定黨治決無繼續存在的理由，會運用種種方法有所表示。假定在抗戰中早有一個聯合政府出現，使大家都能體會戰時戰後的種種艱難，並且在戰時即能有一部爲各方所同意的憲草，我們想勝利以後的局面斷不會鬧到今天的這一樣。當時確實有人是這樣主張：認爲一切可能發生的問題，必須利用戰時求得一解決的基礎，一入戰後，則無論勝

敗如何，必將困難百倍。當時有人懷疑這是危言聳聽，或者懷疑想趁火打劫，把一時的政權看得那樣寶貴，因此便時機坐失！談政治貴乎知「幾」，「幾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機會既已錯過，姑且不必談它。

就目前論，在表面上好像雙方都願用政治方法解決，可是雙方都互感到對方的誠意不足；事實上雙方都在調兵遣將，可是用武力求得一澈底的解決，雙方各自的信心又都不很強。充國民黨勝利的結果，最多不過把共產黨消滅，果然打到共產黨被消滅的一天，是不是準備索四萬萬五千萬人民於枯魚之市？充共產黨勝利的結果，最多不過把國民黨的政府推翻，果然打到現政府被推翻，以中國內外的條件，又是否可能容許一個共產黨的統一政府的成立與存在呢？如曰共產黨兵力所至之地，即民主所至之地，共產政府成立之時，即民主實現之時，自然這種抱偏見而無常識的糊塗份子，在中國也還大有其人，可是在四萬萬五千萬人所佔的比率，却決不會太大。此外還有一義：在別的戰爭中，只要一遭勝利一遭失敗，問題便可解決，可是非所語於中國今天的內戰。假定今天的內戰真是打得難解難分，其結果則失敗的固然是失敗，勝利的也還是失敗，並且誰勝利得愈澈底，將來所吃的苦頭也越大，這個話在熱心內戰的人也許又認為是危言聳聽，其實事實的歸宿必至如此，如洞若觀火的。

然則政治的解決既希望無多，武力的解決又根本無用，其惟一的路線便只有一會兒政治，一會兒武力的「拖」，拖到那一天？三年五載也不一定，三年五載以後的世界是怎樣？中國又是怎樣？誰也無把握！眼前打仗惟一的好處便是雙方都想顧着面子；最大的壞處便是把全國的人民拖死一大半，把中國的民主葬送到無何有之鄉！然則人民惟有靜待宰割嗎？不，這樣的人民只是愚懦之民，假定人民不盡是愚人，不盡是懦夫，能自衛的必將起而自衛，能呼號奔走的，必得還要呼號奔走，其目的則在使雙方就範，就誰的範？就人民的範！誰就誰的範也許是一種恥辱，但就人民的範却是無上的光榮！

其次談第二個問題。我們對於這一點，只有幾句老生常談可說。今天的求學與就業，自然都是很

艱難的，可是有了機會却不可輕於放棄。不要以為亂世便不能讀書，歷史告訴我們：有許多有學問的大人物，却正是從亂世裏滾出來的。一個青年朋友自審能力，既不見得於當前的局面有多大的補益，則不如退而預備自己的本領，有一句俗話說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許多中年人一入世途，便感到自身的能力不足，何況社會愈進步，人才所需要的知識水準便愈高，今之青年，豈可自貽將來的後悔？

我們親眼看見許多青年，當其未得到適當職業的時候，便惶惶然要謀得一業，既就業以後，却又意馬心猿的不能自安；或嫌環境不好，或嫌待遇太低，或覺名位無法提高，或落落寡合而難與同事相處，總之，既怨天，又尤人，而發覺自己能力太差，經驗太淺的却概不多見。青年人最富於向上心，其不能安於任何現狀，自是情理之常，無可詫異。可是有一點必須認識明白：古今中外的一切成功者，十之八九都不是一帆風順，甚至所遭遇的挫敗愈多，其成就也愈大。因此要向上是對的，處在某一環境中而能憑着自己的努力使其環境能够改善一部分，豈不更對？就經驗論，中年人老人應該表率青年人；就精力論，精神論，青年人又何嘗不可以薰染比你們年紀大的人呢？譬如在一個十個人共事的小小機構中，假定有七個老大的不大努力，而三個青年人奮發有為，我想那七位老大的朋友也會感到慚愧而要跟着青年們跑的。假如不這樣，一面老年人看不起青年的能力，一面青年人又瞧不來老年人的頹廢，則只有相輕相怨，而坐聽事業敗壞於冥冥之中，像這樣的國家，這樣的社會，還會有希望嗎？

再其次，關於加入政黨一層，我們願意老實說：今之一切黨派都有毛病，都不健全，假如你們願意加入某一黨派去共同創造，則隨你自己的高興，任何黨都可入；如認為加入某一黨便可得着憑藉，這在動機上便已大錯。我們認識：中國還要繼續不斷的遭遇艱難，因此說到青年黨，我們便只能歡迎可以共患難的朋友，我們相信我們這一輩子決無所謂共安樂可言！最後我還要補說一句：如果自己的

政治興趣不太濃，一個青年人入黨並不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不如先求一個清楚的認識，先求得自身可以為政治奮鬥的必具條件。至於什麼是從事政治必具的條件，我們想留待有機會再說。

最後說到當前的生活情況，這是一個整個的全面的問題，決非單獨所能解決。站在個人的崗位，惟有在可能的條件下力求改善，力求節約。今後的演變，還有比今天更壞的可能，有一碗稀飯一件布衣不算太破，隨着潮流與別人去作豪華的競賽，大可不必。今天早上遇着一位朋友，他說：美國人願意幫助中國是很可感的，但幫助的出發點如僅僅着限於軍事與政治，這可能勞而無功，不如回轉頭來，着重於經濟和教育文化，反而有助於整個問題的解決。我承認這位朋友的見解不算錯，所以附記下來以備大家的參考。

評民盟最近主張

五月二十二日

民主同盟代表張君勳黃炎培沈鈞儒章伯鈞梁漱溟五君，分電蔣主席及毛澤東氏，表示主張三點：
（一）中共軍隊撤出長春；（二）中央不再進兵長春；（三）東北政務委員駐長春，主持政務，就地組織警察行使職權；所有委員人選由各方協商而中央簡命之，其他一切問題，概俟停戰後協商解決。

這個提議，我們大體可以贊成，但應有補充說明者如下：

（一）政府接收長春，本係根據中蘇友好條約，其派遣少數軍隊及一部分接收人員，亦在蘇聯同意下行之，且長春高級官吏如市長趙君勳等早已就職，可見接收手續已大體完成。中共於蘇軍撤退後二十四小時內即開始進攻長春，且係以多勝少，跡近乘危，不僅政府方面所受刺激甚深，即對人民，印象亦極不良。繫鈴解鈴，中共既主張無條件停戰，自以首先無條件退出長春為是。

(二)東北在過去半世紀以來，本爲一最易釀成國際紛爭的地帶，日本過去之製造滿洲國，其藉口亦在保障自身的安全；今日認東北爲其自身之安全地帶者，乃又另有人在。中共於勝利以後，即汲汲於奪取東北，且在蘇聯佔領期間，即已佔得若干區域，內啓國人之疑，外召國際之忌，無端牽入未來國際鬥爭漩渦，增加自身無窮的困難，究竟於藝何取？謂必佔領東北始足以實現民主乎？抑非佔領東北即不足以滿足他人之安全感乎？前者爲吾人所不解，後者爲吾人所不忍信，中共必求有以自解於國人。

(三)所謂停戰協定，並不是一紙白紙黑字的空文，其後面必應另有一種精神在，如謂關外不在停戰範圍以內，即可自由行動，則所謂停戰協定的精神即已破壞無餘。國民所希望的停戰是全面的，決不是局部的，假定中共能尊重國民的公意，即無論關內與關外，均不應有戰爭的行爲。

吾人日責政府以實行民主，無論在法律上事實上均應趕快結束一黨專政，實現聯合政府。萬一因內戰不已，使國民黨覺得一繼續訓政的良好口實，甚至由訓政時期仍復回到軍政時期，則全國主張民主的人士數年來所有的一切努力，即將付諸流水，情形果至如此，中共難道可以說這個責任全在國民黨而自身毫不負責嗎？

總之，吾人對中共二十餘年之奮鬥史，從黨派的立場視之，自來予以尊重。但吾人希望中共必須以民主爲目的，而不僅以之爲手段，且須提高其對國民對國家的責任心，而不可自毀其前途。

我們希望兩方面對於民盟的提議，均能予以深切的考慮，使協商的僵局仍得打開，依然走上和平團結的大道，這實在是全國人民一致的期待。

發揮協調的精神 五月二十六日

日軍投降了九個月，國內擾亂不甯也達九個月。勝利來臨之日，便是內戰爆發之時，爲什麼八年來全國人民用血淚汗所辛苦換得來的勝利，應該糟踏於不必要的內戰之中？有的人責備中共，不該在勝利後爭受降，致啓戰機；有的人責備政府，不該在勝利前採取「拖」的政策，把國共談判及黨派會議久延不決；有的人責備中共，沒有誠意，協議隨時可以推翻，市價見風高漲；有的人責備政府，也沒有誠意，恐怕政權開放，大權旁落，失掉領導的地位；有的人責備中立的黨派，並不能嚴守純正中立的立場，作有力的發言，以盡排難解紛之責；有的人責備社會賢達，孤芳自賞則有餘，曲突徙薪則不足。互相責難，則互信不立；各持己見，則協商難成。沒有充分發揮互信和互讓的精神，所以「政協」和「軍調」，都不易得到有決定性的協議。因此，有許多人對政治前途，感覺失望與灰心。

其實，責難，失望，和灰心，都是多餘的，這一切互相責難和失望悲觀的現象之表現，都象徵着史無前例的現代化的民主新中國之誕生，正在陣痛的難產之中。西諺云：「羅馬不是一天造成功的」。民主是需要學習的，民國雖然有三十五年的歷史，但過去內憂外患佔了大部分的時間，使人民，政黨，以及政府——中央的和地方的，都沒有機會好好學習民主，所以政治民主化的課題，在戰後中國，今天還是大家所要上的第一課。中國這隻古典的舊船，在今天才開始嘗試作「民主的處女航」。全國人民，社會賢達，和各黨派領袖，必須本同舟共濟之義，一致努力，航登彼岸目的地。學習民主，如同學習游泳一樣，學游泳便得親自實地去下水游泳，學習民主便得朝民主的方向和道路上，實際開步走，最初的一步是最難走的，但也是最重要的。如像游泳最初一次學着下水是一樣的艱難和重要。學習游泳，便不要怕打濕衣裳；學習民主，便不要怕衝突和磨擦，也不要怕忍讓和妥協。

貝爾納斯會云：「和平必須建立在互相諒解與互相尊重的基礎之上，不可以縱橫捭闔的手段獲致之。」這就是說，彼此必須相見以誠，必須根據公理與正義來建設和平。所謂和平，必先得其平，然後始能和諧。必須以忍耐的精神，體諒對方的困難，然後才能養成互信互讓與通力合作的態度。

一般人都以為蘇聯的態度是非常倔強的，尤其莫洛托夫。其實不然。在倫敦會議陷於僵局，宣布延會之後，莫洛托夫曾致函英外相貝文，函云：「在我離別我們同盟國，大不列顛——邊疆之時，余請求閣下轉達英國政府對余之熱誠招待及深摯之友情，表示謝意。我深信在戰勝共同敵人之後，為英蘇兩國人民利益計，為鞏固世界和平計，吾人將來之合作，必將繼續，既經克服中途所遭遇之種種困難後，吾人將繼續聯合努力，以期完成此種偉大之目的。」這個和平中正，充滿了互信與互助精神的莫洛托夫便被一般人遺忘了。就賴這種精神，才使巴黎四外長會議有續開的可能。巴黎會議雖又告延會，但是列強間的了解，同時也推進了一步，國際間未來的合作，還是要靠這種精神維繫下去。

貝爾納斯會云：「美國願意以狄克推多的和平，加諸敵人，但不能以狄克推多的和約加諸其同盟國。」和平與政治的進步，在國際上與在國內一樣，是有賴於理智的協調的。今日的中國，在學習民主合作，今日的國際社會也在學習民主合作。

今後國共雙方如能本互讓互信的精神，發揮理智協調的作用，同時各中立黨派及社會賢達，均能為人民及國家設想，仗義執言，排難解紛，則中國現代化和民主化的工作，並不難完成。經過了過去長期的磨擦，衝突，和會議協商，國共雙方及各黨派以及社會賢達，應該已得了一個深刻的教訓和現實的經驗：任何那一方面，都不能完全照自己的意思，草擬民主和平的具體方案，我們知道在國際列強之間，英美兩國意見雖然一致，實力雖然強大，原子秘密雖然在自己掌握之中，尚且不能，也不願以狄克推多的和約加諸其友邦蘇聯，蘇聯也無法以其一國之意見強英美接受。那嗎，我們國內的和平與民主，也必然是有賴於各方面的協調與合作，才能完成，這是毫無疑義的。

現在國內物價飛漲，民不聊生，戰後瘡痍滿目，法紀蕩然無存，生機毀滅殆盡，實在再不堪遭受內戰的破壞了。中共表示在任何時期都不拒絕商談，政府也早宣示長春收復後，和平協商即可繼續進行。我們深盼國共雙方，以人民和國家爲重，速即結束軍事行動，立即重開政協與軍事三人小組會議，以和平方法，解決一切政治軍事問題，使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目的，得以早日促其實現。玩火者必爲火所毀滅，兵凶戰危，武力絕不可靠。民主和平的新中國之誕生與滋長，是需要熱烈的愛國精神和理智的協調精神予以栽培和灌溉的。

對國事要樂觀

五月二十九日

在八年以上的堅苦抗戰裏，中國人民是苦痛的，但却不是悲觀的，因爲人人心中存一勝利的希望，人人心中有一勝利後黃金時代的憧憬。天快亮了，天一定要亮的，人人這樣想，而天亮果然也就隨原子彈時代而到來。勝利當頭時的爆竹，曾給長期抗戰中的中國人民以何等的空前快樂！這記憶還在每一個人心目之中。

但是隨着勝利，鉄一般冷酷的客觀事實也隨着展開我們的面前。勝利以後的中國，不是一個夢想的中國，而是一個冷酷的事實的中國，面對着一切冷酷的事實的中國人民，頓時從極端樂觀的氛圍墮落到了悲觀的深淵，這是無足怪的。充這種悲觀空氣之所及，可以使一切向上的努力都化爲烏有。人祇作五日京兆的打算，拚命搶錢，拚命享樂。一個民族充滿了這種世紀末的思想，行爲，和態度，這個民族的前途，是無可救藥的。

我們必須替大家指出，眼前種種現象的悲觀是事實。但這種種悲觀現象，却並不是不可救藥的。相反地，我們如果認清了悲觀現象的動因，則這一切現象並不是不能醫治的。

今天擺在眼前的一切可悲的現實，分析起來，不外以下幾種：第一是紛爭。從辛亥革命起，中國人抵內戰就打了整個三十五年，就連一致對外的抗戰期間，也並不會根絕了國內各種勢力的相互火併。第二是貧窮。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的生活，一天一天接近貧窮線。八年的抗戰，更加速了中國的貧窮化。第三是腐化。貪污和泄沓，都是腐化到底的徵象。國民道德，墮落到了最低度。第四是黑暗。政治上社會上的專制黑暗，越到下層越利害。淳樸的人民，在各色各樣的專制虐政之下，失掉了一切自由，和人生的最低權利。造成人心悲觀的客觀事實，歸納起來，不外這四種。

紛爭現象的造成，主要由於野心侵略國家的策動，而過去日本的軍閥，應負的責任最大。日本的傳統政策，是分化中國，不許中國大陸，有一個統一強固的政府。就在抗戰以後，對於所親手培植出來的漢奸傀儡，也是如此。在長期戰爭中，日本軍閥在所控制的區域，盡量地破壞中國的社會秩序，摧殘中國人民的經濟力，直接間接製造各種武力的集團，以致在日本投降以後，留給中國的是一片紛亂，猶如亂絲。今天要根治這種現象，必須提高人民的國家意識，使紛亂的力量，在國家至上的信仰下團結起來，才可以脫離野心侵略國家的影響，而獨立建國。

貧窮現象的造成，一半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一半也由於中國政治的不安和腐化黑暗勢力的猖獗。要根治這現象，只有促進政治的民主化，使國家政治走入開明建設的軌道，則人民才能慢慢安居樂業，恢復固有的生產力，才可以談到用國家的力量，去防止外國經濟力量的榨取。

腐化和黑暗兩種現象的造成，主要是由於二千年長期專制政治的結果。近三十五年來，中國在形式上，雖號稱民主，實際上專制思想，獨裁思想，甚至英雄主義的帝王思想，還充滿了一般政治上領導人物的腦筋。結果口口聲聲說民主，說人民，而實際上所圖所謀的，却依然是傳統的獨裁專制。全國各地，還存在着無數大大小小的皇帝。在每一個皇帝之下，都有一些御用的爪牙，在那裏張牙舞爪，吞噬人民。像這樣情形，人民焉得而不貧窮？政治焉得而不腐化？不黑暗，甚至紛爭？要根治這幾

種現象，也只有促進政治的真正民主。人民真正有了民主的權利，能够自由反抗一切虐政，政治才能免於腐化和黑暗。

因此，國家觀念和民主政治的養成，是根治中國目前一切悲觀現象的主要靈藥。我們只有堅定地依賴這兩種靈藥，才可以根絕了眼前的一切悲觀事實，而中國必然向這兩條大路去走，也是無疑的。一切違反國家與人民利益的勢力，必然會有自行淘汰的一天。在這種正確的認識之下，因此我們對國事並不悲觀，並且也希望全國人民鼓起樂觀的勇氣！

告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們

六月一日

中國必須走上民主的道路，這是命定的，可是假如要求民主的人過於蠢笨，則中國民主的前途可能發生波折。這種波折的現象，大抵不外兩種：一種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民主其名，而不民主其實；一種便是對民主來一次澈底的大反動，把中國逼入一種長期的殘酷的革命狀態之中。

上舉兩種現象無論是出於那一種，都可以使中國一直糟下去，糟到全國人民發生空前的死亡；糟到一切工商業全部破產；糟到外國的經濟勢力無限制的向中國伸長；糟到挾有大量資本的官僚完全不愛國家，一切托庇於外國經濟勢力之下，而以自身為其工具，而以國家為其附庸；等到一天因國際種種因素的醞釀，果然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則中國除供人利用，供人驅使，供人宰割以外，將不復成爲一個國家，這些話決不是全憑想像的危言聳聽，一切眼前的事實，都是真憑實據。

某報常常責備政府低能，以二十年來秉政的結果，鬧到今天全國的人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說它低能還有什麼話可說。可是感到不足的，便是某報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國的一切現象其所以鬧到如目前的不死不活，政府低能僅僅能說明一方面，假定在野的有力黨派與社會有力的賢達果然

多少有些智慧，我們敢說中國便再糟也不會糟到如此。甚至中國的民主已經可以開步走也不一定。

中國本來沒有所謂民主，整部的歷史便是走的與民主相反的路線，以中國人的頭腦，中國人的態度，中國知識分子的懶惰，中國大多數人民的愚昧無知，再加上一切生活習慣之難於矯正，說今天才喊出民主，明天便可以民主兌現，這便把民主看得太不值錢。我們始終相信實現民主是有步驟的，只有一次一次兌現的民主，決沒有整批兌現的民主；一次一次兌現的民主是爭來的，整批兌現的民主是賜予的；只有由人民自己爭來的民主自己才知道寶愛；賜予的民主今天可以整批的賜予，明天也可以整批的收回。

以中國大多數人民的愚昧，民主的實現顯然的只能由簡易趨於繁複，假定不按部就班而躡等躁進，則以毫無民主素養的人民，以之運用現代繁雜的民主制度，其勢必始也感到茫然，繼也陷於凌亂，最後乃流於厭倦。果然等到人民對民主發生了厭倦，則必有野心者起，利用人民這種弱點而使政象復返於黑暗。所謂欲速不達，求前反却，在若干頭腦簡單，在目前的情況之下即期求實現高度民主的人們，是最容易犯着這種毛病的。

我們承認在今日的中國實現民主，作民主運動者必須具備若干的力量，對於這種力量我們可以放寬尺度連一部分的武力也包括在內。清末的皇室所以不能不汲汲於籌備立憲，便是因為有個革命黨在那裏積極活動，然後立憲派才有說話的餘地。可是運用力量必得小心，第一、不可誤虛聲為實際而自我宣傳中毒；第二、不可因一部分的開明分子多少寄以同情即認為天與人歸而衝昏了頭腦；第三、自身具有若干力量的人們，對於因利乘便並無真知灼見而亂唱高調的投機分子，最宜警戒，不可誤認為這類角色除掉其自身的風頭以外，對於民主的促成真有多大的益處；第四、中國人幹政治，因為側重在人，最容易引起恩怨，今日一部分貌似急進的分子，其實並不是真能急進，其目的不過想摧毀現狀以發洩其自身的一股怨毒，這種人對於中國今後的政治究應如何推進，實際是很空洞的。假定具有相

當力量的人們，而又真想實現一點民主，如果錯認這類所謂急進分子，以爲憑着他們的吵吵鬧鬧，便可以作自己的先驅，這等於治絲益紛，其結果可能上當。

總之，歸根返本，我們決無高調可唱，第一、我們還是要努力爭取人民的基本自由；第二、無論用任何方法，任何形式，必須使黨治提前結束；第三、官僚的氣餒與作風必須加以遏止，而逐漸做到催陷廊清；第四、解決當前人民的生活問題，必須採取緊急措施，不容絲毫忽視。至於憲法如何美妙，國大如何理想，人事如何安排，各方面的面子如何顧到，這在今天都算是第二義。

兩重統治下的人民

六月四日

現在事實上許多地方受着兩重統治，一重是國民政府的統治，另一重統治者尙無普遍適用的名稱，可姑名爲共產軍權。老百姓對於兩個統治者的政績，素來不敢批評，更不敢說孰優孰劣。我們謹守大耳朶百姓的立場，不作上下床之分，祇是根據耳聞目見的事實，說說老百姓在兩層統治下的痛苦。

第一、在兩重統治下，人民具有兩重負擔，而且這兩重負擔，又不期然而同落於農民之身，兩方面都以田畝爲課稅的對象。我們不能不感激蔣主席，將收復區的田賦豁免一年，讓人民稍紓喘息。但是這一負擔免除了，其他的負擔又接二連三的來了。目前人民在國民政府統治下的最大負擔，一爲指購軍糧，其間弊病百出，民不堪命。另一爲鄉政經費，任意攤派，名目繁多。有一位縣長榮膺國大代表，各鄉長議決每保恭送程儀一萬八千元，該縣有一千幾百保，即此一項便是兩三千萬元。在另一方面，共產軍權征收田賦，絲毫不放鬆，有的地方三十六年度的田賦已經征完。並且不但點滴不得短報，反將大畝折成小畝，從前的一畝作爲一畝半征稅。限期交納，急如星火；到期不交，即拘押不貸。兩重統治下的人民所過的生活，這是一種情形。

第二、兩方面間的敵意，同樣強迫人民接受，每一方面都責令人民不得與對方發生關係，不得向對方完糧納稅，不得在對方担任公職，不得奉行對方命令。不然，通匪的罪名便來了；不然，動搖份子的頭銜便加上了。人民還了稅，交了款，不敢問收錢的人是誰派來的，從而不敢要收條。因為政府只有一個，並無第二家，如何敢問他是那一家政府？政府需款孔急，愛民甚切，不必要，何至要錢！有必要，人民必然擁護，又何敢計較出多出少。這是說不敢問；其實說亦不敢說；譬如我完過了糧，有一官員問我，你完糧沒有？我就難答。我說沒完過呢？他馬上便要我完？我說完過呢？他要看證據，我沒有，沒有而說完過，便是刁民。更且不知問者屬於誰方，萬一知道我向他的對方完糧，則禍且不測。這是兩重統治下人民的又一種情形。

上面說的，是就一種地帶而言，是某一方面自命屬於他的。其次，還有一種地帶，是顯然為某一方面所不能獨有的，於是產生第三種情形，便是「最惠待遇」；意思是說：怎樣待遇我的對方，也就怎樣待遇我。對於對方的官人，放過鞭爆迎接，對我方官人亦要鞭爆迎送。對於對方的委員辦過酒席欲待，對於我方委員亦必須酒肉相待。不然，便是有意反動，或不前進，決不寬饒。

以上三種情形，在兩重統治下的人民也就够受了，不必再多說了。我們是老百姓，為減輕負擔計，為不在夾棍下討生活計，我們要求統一！我們要求祇要一個政府！一切好聽的名辭，都是那末一回事！我們要活，我們要統一！

貢獻給毛澤東先生

六月九日

毛先生已經是五十四歲的人了。國民黨有了五十年的歷史，中國共產黨也有了二十五年的歷史。共產黨的初期領導者雖不是毛先生，但最近十多年以來，毛先生之為中共領袖，已屬毫無疑義。

在民國這三十幾年當中，全國老百姓可以說天天在內憂外患中討生活，在最初若干年，中國還不會有共產黨，民國初期的紛亂，中共自可不負任何責任。就在這最近的二十幾年，中共在整個的局勢中所處的地位雖日顯其重要，但我們並沒有理由說出中共所應負的責任比較任何方面應該特別多。可是中共既是這紛亂局勢中的一環，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環，其不能自脫於責任的範圍以外，當係無可否認的事實。

尤其在勝利後的這十個月，我們一方面既感到執政的國民黨處理一切之未能盡善，同時也覺得中共舉動之稍欠思索，一切詳細情況可略去不談，一言以蔽之，兩方面所給予老百姓的印象都不甚良好而已。

在東北經過一番紛擾以後，現在居然爭得十五天的休戰時期，這不能不認為是時局的一個轉捩點。周恩來和陸定一兩位先生，已帶着重要的使命飛往延安，因此我們想藉此機會把我們所要說的話公開的提出向中共的領導者毛先生說一說。

一、不願再受內戰的痛苦，這確確實實是全國民眾一致要求。國民黨應該接受，共產黨也應該接受。在老百姓眼中，他們不只看見國民黨在打共產黨，也看見共產黨在打國民黨，把發起內戰的責任推卸到任何一方，認為於自己無干係，這在一個不抱偏見的老百姓是不能這樣想的。因此，內戰必須要停，而且要永遠的停，無所謂十天半月；同時要澈底的停，不能在東北不打，在東南或西北又打。萬一不幸停了一會又打起來，則老百姓不只會對國民黨發生厭倦，同時也必然會對共產黨發生厭倦，所以永遠的澈底的不打內戰，不單只是爲了老百姓，同時也是爲了自己的黨！這就是爭取老百姓的同情說。

二、在今後的若干年內，美蘇兩國在遠東所處的地位是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的，而且是勢均力敵。我們只利於美蘇兩國之和，決不利美蘇兩國之爭，無論是親美以抑蘇，或親蘇以抑美，都算是爲自己

的國家掘墳墓！因此我們覺得國民黨不只要與美國保持友好，同時更要與蘇聯保持友好；共產黨也不單是要向蘇聯表示親切，同時更要向美國表示親切；「國」可以親蘇，「共」也可以親美，這不僅會對中國發生良好的影響，同時也會對世界的和平發生良好的影響。這個很淺近的道理，我們相信國共兩方的負責者都很明白，可是一到了某種場合，却往往「沉不住氣」，共產黨所犯的毛病，與國民黨所犯的毛病，又好像如出一轍，毛先生難道以為一為共產黨便永遠無法爭取美國的同情嗎？我們看事實上並不是如此的，只看美國可以贊成在中國有一個包括共產黨的聯合政府出現，而並不贊成國民黨繼續一黨專政，便是有力的證明。這是就爭取國際的同情說。

三、我們知道共產黨有一種恐怕國民黨不能實行民主的疑慮。我們不願說這種疑慮是毫無理由，但我們希望共產黨就這個問題能有更進一步的考慮：今日要求在中國實現民主的，不單只是共產黨，也不單只是中國人，所謂大勢所趨，即令國民黨對於過去二十年的歷史依然不無留戀，但這個大勢是無法違反的，此其一。中國本來不會實行過民主，以今日中國的一切條件而論，無論是那一個黨代國民黨起來單獨執政，說今天登臺，明天民主便可實現，我們決不相信會有這種奇蹟。毛先生自己說過，在邊區實行一點二五減租，也經過了無窮的困難，何況要實行一套對中國人異常生疏而又繁複的民主制度呢？我們相信：即令聯合政府可以成功，國民大會可以召集，憲法可以頒布，不民主的事實也還是會有的。我們所應該研究的是中國人要如何才能實行民主，決不完全在國民黨不肯實行民主，我們所期待的民主是一步一步兌現的民主，是腳踏實地的民主，是一直前進而不後退的民主，但我們却不敢過分信賴一紙白紙黑字的美滿憲法，因為憲法也決不是一天可以全部兌現的，此其二。

四、我們知道共產黨相信：要在中國實現民主，必須有一種力量，武力便算是最具體的力量之一種。這個意思我們一半可以贊成，一半則不無疑懼，換言之，運用武力對於實現民主並不是完全無益，但要運用得恰如分際，却大不容易。譬如水火於人生，本來是一天也不可少的，但是一不小心，却

可以淹死燒死。我們相信軍隊必須要國家化，無論國民黨或共產黨，均不能長此保留所謂「黨軍」，並且要一直做到完全看不見黨軍的痕跡，內戰才能够永遠的消弭。馬歇爾先生親口對記者說過：「你們這個原則是完全對的，但要切實做到，真是談何容易！」馬歇爾先生對筆者的印象，是一位重現實而又富有理想的軍人政治家，所以他所主持的整軍方案，規定得有很明確的期限與步驟，他決沒有要使中共無條件的繳械，而使中國民主落空的意思。可是要使整軍方案見諸實行，決不能期待任何一方單獨努力，必須國共兩方共同努力；不單只要從放棄黨軍的形式上努力，而且從放棄黨軍的心理上努力。自然，軍隊國家化必須與政治民主化有一種扣得很緊的配合，這在我們最初提出這兩個口號的時候，本來是經過深長的考慮的，毫沒有偏袒的意思夾雜在內。有人希望共產黨多從軍事上讓步，國民黨多從政治上讓步，這並不是一種很妥當的說法。我們所期待的是：國共在軍事上相互讓步，以做到軍隊國家化為歸宿；國共也同時在政治上相互讓步，以便使得政治民主化可以提前開始。

毛先生能不負全國國民的期待，在去年的八月居然能從延安飛到重慶，住上一個多月，隨時與蔣主席作意見上的切實交換，我們相信，假定要出全國國民於水火，要使聯合政府見諸實行，要使整軍方案推行無阻，在今年的夏末秋初，毛先生再作一度的南京之行，似乎是不可省略的。筆者很希望這個意思不會被人指為過於高調。目前的政治空氣所缺乏的是坦率誠真，我們不只相信蔣主席有此襟懷，也相信毛先生一樣的有此襟懷，去作兩位握手言歡，便是可為筆者這個說法張目的一個鐵證。

中立與公平

六月十一日

——請教羅隆基博士——

羅隆基博士到上海來了，下車伊始，便發表了不少的高論，尤其對「中立」和「主權」兩個名詞

的解釋，最值得我們玩味。

羅博士說：「有人罵我們不够中立，那真是好笑！我根本不承認我是中立，因為我不是馬歇爾，我不是外國人，我沒有聽說過中國人對中國的內戰應該守中立！我們只應該有是非，是就是，非就非，沒有什麼中立，只有外國人才應該中立！」

我們相信這段話完全是羅博士說的，記載也沒有走樣，因為我們知道羅博士說話就有這一股子神氣，所謂「言偽而辯」，「似是而非」，本來不值一駁，可是對於一般青年依然可以蒙混，為着青年們免受欺騙起見，還是不能不駁正幾句。

羅博士說中國人對中國的內戰不應該守中立，應該有是非，對，而且很對很對。可是講是非的不必守中立，講是非的難道不應該公平嗎？自從羅博士事實上做了民主同盟的發言人以來，發表的談話真是不少，可是總是千篇一律：國民黨有百非而無一是，共產黨有百是而無一非！例如羅博士常常責備美國不應該把武器裝備政府的軍隊，以致擴大了中國的內戰。可是我們要請教羅博士：所謂三四十萬的東北「民主聯軍」，他們手裏也都拿着大正昭和兩個時代的新式武器，而且就憑着這些武器佔領了東九省的七八省，這才是中國內戰擴大的真正原因，羅博士以為這些武器都是從共產黨的兵工廠裏製造出來的嗎？或者都是由共產黨直接向敵人的手裏繳來的嗎？假如不是的，那便是經過了另一外國朋友的手，然後轉移到所謂「民主聯軍」。在我們的眼中，拿着外國的武器在中國打內戰，共產黨之於國民黨，最少也不過是二五等於一十，要責備便應該兩面同時責備，為什麼羅博士對國民黨則責備得無微不至，而對共產黨則連他們的一根毫毛也不敢動一動呢？像這樣，羅博士不願守中立的一點，自然是辦到了，可是在「是非」和「公平」的兩點上看，豈不是羅博士自己放棄了自己的立場？在這裏我們必得聲明：我們說羅博士放棄了自己的立場，並不是說民主同盟也放棄了自己的立場，因為羅博士是羅博士，民主同盟是民主同盟，羅博士的意見和民主同盟的意見，絕對不可混而為一。我們很

知道民主同盟是一種特殊組織，誰人高興如何說便可如何說，並沒有所謂「黨紀」或「盟紀」之類，對它的盟員可以加以任何矯正的。

其次說「主權」，我們還是代表羅博士義務宣傳，先把他的高論恭錄如下：

羅博士說：「至於說主權，那更其好笑了，東北老早沒有日本人和蘇聯人了，東北有的只是中國的同胞，那裏會發生主權問題呢？如果要談主權，只有老百姓向現在的政府要求接收主權，絕對不會是政府向老百姓要主權，甚至用武力去接收主權！」

我們知道主權兩字是學理上一個頗費解釋的名詞，同時我們知道羅博士是拉矢基先生的高足，假如我們要和羅博士高談學理，保不定羅博士會要搬出一套「王大娘裹脚布」式的講義出來，給你來一個糾纏不清，又長又臭。無已，我們惟有就事論事，請羅博士就下列的幾個實際問題，加以適當的解答：

第一、羅博士是不是承認現在國民政府至少還是國內國際所公認的一個事實政府。

第二、如果羅博士不承認，爲什麼羅博士又毛遂自薦的充當一名政協代表去和政府的代表坐在一塊兒高談和平？高談團結？

第三、假如羅博士還承認的話，那末，請教羅博士，你看見那一個國家有一個爲人民所公認的政府，可以放棄其職權而聽憑少數攜有武器的老百姓，高興佔領那一個城池就佔領那一個城池？高興破壞那一條鐵道便破壞那一條鐵道？

第四、在羅博士眼中，今天的共產黨究竟還是一個以武力實行革命的黨？或者還是一個主張和平團結的黨？如果是前者那便「進軍南京」也談不上什麼應該不應該；如果是後者，那便把政府已經接收的城市用武力奪取，又依然回轉頭來責備別人發動內戰，在理論與事實上又如何講得通？

第五、不錯，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中華人民的全體，可是，我們要請教：究竟代表人民行

使主權的還是爲人民所承認的政府呢？還只是一羣攜有武器的老百姓呢？羅博士儘可指摘現在一黨專政的政府太不合於民主，可是羅博士不明明在那裏和政府的代表商量憲法，要用憲政的方式來改造當前的現狀嗎？既主張用憲政的方式來改造現狀，爲什麼又無條件的說「只有老百姓向現在的政府要求接收主權」呢？無條件的向政府去接收主權便只有革命，人民既要革命，政府當然也可能應付革命，爲什麼羅博士又苦口婆心的天天在高呼不打內戰呢？

本來值不得說這些話來麻煩羅博士，可是不幸在反對內戰一點上，我們依然是羅博士的同志，我們認爲羅博士近來的言論確實與內戰的擴大有關，所以不能不鄭重的提出來請羅博士考慮。

「軍隊國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正確意義

六月十二日

解決當前中國問題，只有從政治和軍事方面雙管齊下，要想抽出其中的一個問題來單獨解決是不可能的，因爲整個問題的各部分之間，彼此都有關聯性，我們不能希望單解決其一而忽略其二。

要同時解決這兩個問題，必須依照「軍隊國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原則，同時促其實現。這已經成爲全國一致的要求，即當事者的國共兩黨，也並不會加以反對。所成爲問題的，是在怎樣的方式中，促使這兩個原則同時實現。

一般人有一個錯誤的看法，就連馬歇爾特使也不是例外。這就是說，在政治上要壓迫國民黨多讓些步，在軍事上要壓迫共產黨多讓些步。作這種說法的人，在暗中已經有兩個假定的前提，就是說國民黨已經做到了軍隊國家化了，所剩下的只有共產黨的軍隊還不肯就範，所以只要壓迫共產黨接受整編的規定，中國的軍事問題，就可以解決，軍隊就已經做到了「國家化」。同時，另一個假定，是假定政治不民主的現象，祇在於國民黨的統治範圍內，在共產黨的統治區域，即所謂解放區者，民主已

經不成問題，所以只要壓迫國民黨改革政治，中國的政治問題就可以解決，政治就可以完成「民主化」了。

我們反對這種看法，因為與事實不符。就軍隊國家化的原則來看，今天國民黨的軍隊號稱「國軍」，但這個「國」字是「國民黨」之「國」呢，還是「國家」之「國」？其意義尙欠分明。過去統帥國軍的是「軍事委員會」，現在軍委會取消了，改組爲國防部，隸屬於行政院之下，以政馭軍，這當然不失爲一種進步。但這個可以統率軍事的國防部，牠的組織和長官的人選，却是由國防最高會議所決定的，而國防最高會議這個機關又是由國民黨中常會所產生的，因此，在統系上依然是國民黨的中央黨部統率着全國的國軍，換言之，就是所謂國軍依舊是一黨的軍隊，同時，國防部關於軍令部分，又須聽主席個人的指揮，另外沒有一個機關，能夠有約束主席個人軍令權的能力，照這樣看起來，所謂國軍，還依然沒有脫離私人軍隊的性質，既然是一黨的軍隊甚至是個人私有的軍隊，就無法使敵黨相信可以把自己的黨軍交出來而獲得完全的保障，這就是當前軍事問題的癥結所在。要解決這個問題，不是單靠國共直接會談所能成功的，必須把軍事統帥權交給各黨各派和無黨派成見的人共同主持，然後受整編者才能放心。因此共產黨所主張的「成立聯合統帥部」一點，並不是沒有值得考慮的理由，像眼前的問題，如果讓朱德之流的共產黨軍事領袖能夠有參預全國國軍的指揮調動的機會，則兩黨軍事對立的嚴重性，也許可以減少些。

同時，我們也必須指出，就政治民主化的原則來看，不但在國民黨統治之下需要促進，在共產黨的統治區域之內，民主的成分，人權自由的保障或者還更缺少些，更須得加以督促，這也是不可諱言的事實。共產黨自然會說，我們之所謂民主，非你們之所謂民主，最近英美與蘇聯會爲對於民主意義的解釋不同，而發生爭執，中國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是政治協商會議所通過的「和平建國綱領」，是共產黨代表所曾經同意過的，其中所規定的保障人民的身體財產居住遷徙以及一切自由，也是共產黨

所同意的，試問在今天所謂「解放區」之中，人民的這幾項基本自由權利，曾經得過多少的保障！遠的不必說，蘇北流亡民衆的呼籲之聲，在上海不是不能聽到的。我們以為以爭民主自命的人士，決不可以忽略此點，我們固然應該向國民黨爭民主，爭人權，爭自由，難道就不應該向共產黨的統治者，也同樣替人民爭取民主和自由的基本權利嗎？要政治民主化，便得大家都政治民主化，民主沒有新舊，却有真假，現在國共兩黨口口聲聲都高調民主，事實上却仍然是獨裁，專制，強姦民意，一套假民主的作風，這種作偽之風，如不經第三者公正人士加以公開的指斥和反抗，中國政治永遠不會走到民主化的大道。

鞭策國民黨軍隊國家化，鞭策共產黨政治民主化，這是中國人民的真正任務，也是中國人民應爭取的權利。

論中美邦交

六月十五日

凡是稍稍留意過過去一世紀中美關係的人，都知道美國對華的態度和政策在列強中是比較的良好，她不會佔領過中國一寸的土地，不會要求過一個沿海的港口或島嶼，甚至像庚子那樣由各國共同分享的賠款，她還是首先提倡退還了中國，並且拿這筆款子為中國造就了不少的人才。中國在過去的一百年，遭受了列強若干次的嚴重壓迫，遇着不少的驚風駭浪，總是得着美國直接或間接的幫助，然後才勉度難關。所謂「門戶開放」政策，對於一個獨立國家雖不是怎樣的一種體面，但史汀生在「一九一八」後堅持着對滿洲局勢的不承認主義，却正是由這個「門戶開放」政策演變而來。尤其在這八年的抗戰中，假如不是美國在精神上物質上始終援助中國，中國要以自身的力量單獨的戰勝日本，我們必得坦率的承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在這次大戰以後，美國在世界的地位顯然改觀，無論在歐洲或亞洲，她都負起了空前無比的責任，雖想回到以往的門羅時代，事實上已不復可能。在歐洲有一個老練的英國，她還可比較的感到輕鬆，但整個的太平洋，截至今天為止，却是由美國擔負着警戒的全責。

基於上舉的事實，美國之希望中國成爲一個民主的，和平的，強大國家，這不僅僅只是一種口惠，徒然說着好聽而已，而實在是由於中美兩國過去的歷史和美國當前所處的地位所不得不採的一種政策。質言之，美國並不是特別有厚愛於中國，完全是在爲中國打算；實在是爲她自己打算；也不僅是爲自己打算，畢竟是由於美國人的理想，美國人的襟懷，以及她對着人類的責任感，她不能不爲整個世界和平的前途打算啊！

中國是可能引起世界重大問題的國家之一，因此過去對遠東關係密切的若干國家，都對中國的研究發生很濃厚的興趣，就以往研究的成績說，似乎是日本人最優，英次之，俄法又次之，美國反而有些落後。可是近年的情形不同了：由於中美接觸的頻繁，文化交流的日趨廣泛，以及美國政治軍事人物來華者之日益加多，美國對於中國可以說已經有了深切的了解。美國知道中國不民主即決不能和平，不能和平即無從強大。中國不和平強大，就經濟的觀點言，在美國是絕大的損失；就責任的觀點言，在美國是無窮的拖累。

美國所抱的政策既如彼，對中國的認識又如此，但中國現在居然有一部分人說美國要在中國助長法西斯，要在中國製造內戰，這豈不是太糊塗，太無常識！

就目前世界一般的情勢說，我們不能不有逐漸形成兩大壁壘的隱憂，一旦壁壘已成，也許最後除訴諸武力外，不容易覓得更好的辦法。爲中國計，萬一這個壁壘的形勢終於無法避免，中國究竟何以自處？站在我們的立場，老實說：有人反美，我們反對；有人反蘇，我們還是反對。我們主張和美國英國親善，同時也主張和蘇聯親善。不過所謂親善云者，決不是說倒在美國英國的懷裏，或倒在蘇聯

的懷裏，一個堂堂的獨立國家，不求所以自立自強之道，而隨時存着一種倒在別人懷裏的念頭，這實在是一種可能亡國的劣等民族！

可以說：追求整個世界的和平，是我們當前惟一的目的。也只有在全世界和平的局勢中，中國才有實現民主，和平，強大的可能。可是，我們並不敢担保中國終於不會發見她的敵人。什麼是她的敵人？只有阻礙她實現民主的是她的敵人，妨礙她和平的是她的敵人，不許她強大的是她的敵人！無論與人爲友爲敵，第一個先決條件還是在自己爭氣！

自由主義者聯合起來

六月十九日

——擁護「白魯塞爾宣言」——

昨天報載「比利時京城十六日聯合社電：比利時與英、法、丹麥、荷蘭、瑞士、瑞典及西班牙自由主義派代表今日在此發表聯合宣言，聲明其對於人類精神自由之信念及改造世界之各項原則，此項宣言名曰「白魯塞爾宣言」，係於比利時自由黨百年紀念慶祝會閉幕時發出，其主旨除闡明各國自由主義派人士對於人類之精神自由具有信念外，並聲明反對一切反動或集權政府，主張經濟制度應尊重私人企業，戰爭唯有藉聯合國機構始能予以廢止，自由人爲世界唯一希望。」

我們看了之後，非常地興奮，也非常地覺得重要。雖然電文簡略，關於「白魯塞爾宣言」的內容，全文尙未得讀到，但就電文所傳幾項要點看來，我們感覺到這宣言是值得擁護的，並且更特別適用於中國。

自由主義是十九世紀的主潮，牠是法國大革命的精神所培育出來的。從十七八世紀以來，歐洲的思想家，法國有福祿特爾，孟德斯鳩，盧梭，英國有約翰洛克，亞丹斯密，休謨，德國有吳爾佛，康

德，歌德，席勒，裴希特等，他們這些哲人從政治，經濟，哲學，倫理，藝術各方面來闡揚自由主義的真理，替自由主義奠定了理論上堅實的基礎，在行動上引起了法國大革命，引起了十九世紀上半期的七月革命，二月革命兩大風潮，引起了英國的工業革命，引起了哲學上和藝術上的浪漫主義運動，引起了馬志尼的國家主義運動，由創造義大利青年黨，到創造歐洲青年黨，這一串的革命運動，都是自由主義者的偉大的成就，說十九世紀上半期是自由主義的世紀，也不為過。

自由主義者的主張雖然很多，但歸總一句話，是承認每一個人都有獨立自由的人格，承認個人人格的尊嚴及其價值。盧梭在政治上闡發的是這一點；康德在哲學上闡發的是這一點；哥德，席勒等在藝術上表現的也是這一點。

但是就當一八四八年歐洲的自由主義運動達到了極頂點以後，反動的潮流便相繼而起，第一個是畢士麥的官僚集權主義，第二個是馬克司的階級集權主義，第三個是希特勒，莫索里尼的一黨集權主義，這三種勢力從各個不同的方面向自由主義進攻，他們一致的主張，是否定個人的價值與尊嚴，承認個人自由應當屈服於他種目的之下。從此以後，自由主義者，在歐洲因為受不住這三種反動勢力的相繼進攻，漸漸地退却逃避到西半球去。在歐洲，只剩下英倫三島和西歐法比荷瑞幾個殘餘堡壘，在那裏掙扎。

反動勢力的高潮，引起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在這兩次世界大戰中，全世界都顯明地分成了兩個壁壘，一方面是集權主義的國家，一方面是自由主義的國家。每一次都是自由主義戰勝了集權主義，而以這一次大戰中表現得更為清楚。這一次大戰，打倒了德日義三個專制魔王，希特勒葬身火窟，莫索里尼上了斷頭台，東條之流也快引頸就刑。自由主義的勝利，證明了自由主義的真理，所以才有現下歐洲自由主義運動的復活。

中國儒家的哲學，承認個人的人格價值和尊嚴，本符合於自由主義的思想。不幸二千年來，在帝

王專制之下，自由主義的精神，屢受摧殘，無法發揚光大。民國以來，一切專制餘孽，跳梁至今。今天中國在勝利以後，還不免要遭受內戰的威脅，便因為法西斯專制和布爾什維克專制的兩種反動集權形式，還存在於中國境內。人民在兩種集權之下，都沒有自由，個人的價值和權利，都不被承認。而這兩種集權勢力者，又在自相火併，以人民和國家為其犧牲品。因此自由主義運動在中國的抬頭，不但是應該的，並且也是必要的。

中國今天大家都在講民主。但我們以為與其講民主，不如講自由。因為民主的口號，容易為集權者所利用，民主其名，反民主其實，不如自由這個口號，比較要鮮明得多。只要你擁護自由，就不應該再去利用任何口實去限制人的自由權利，反動者不容易曲解。但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勢力實在太微弱了，需得聯合。因此我們希望一切自由主義者應該聯合起來，不要一味夾在左右兩集權勢力的中間，打躬作揖，學做調人。而是應該與真正的人民站在一起，為擁護中國人民的自由權利，予一切集權勢力以迎頭的打擊！

建國必先整軍

六月二十一日

——我們歡迎美國援華整軍——

抗戰既已勝利，建國工作應即開始。要建國必須首先整軍。因為現在中國共有軍隊三百二十五師，國家預算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軍費，在這種情形下，烏合之眾的軍隊既吃不飽穿不暖，而各種建設事業，也無從着手。所以我們說：「建國必先整軍！」

要完成中國的政治統一，必須首先促成軍事的團結。如果中國境內，依然有兩個對立黨軍存在，時常互相衝突，爭城奪地，永無已時，打疲了又歇一歇，談一談，談倦了，又再打，打打談談，談談

打打，邊談邊打，邊打邊談，那中國的命運和社會的生機，必將葬送於回歸熱式的內戰之中了。

所以中國軍事的統一，實爲促成政治統一的先決條件。因爲國共雙方都有最後一張牌在握，所以政治談判當中，彼此都不肯有所讓步，都認爲我有最後一張牌可以拿出來制服政敵。這最後一張牌就是自己的武力。其實中國軍隊，無論政府軍或共產軍，在國內壓迫老百姓是有餘的，而對外禦侮則不足。過去八年的抗戰，國軍由蘆溝橋退到獨山，共軍也未嘗越山海關一步。一到日軍投降，兩軍便征騎四出，爭城奪地。共軍更藉蘇聯之開道，於是兼程并進，拿出過去萬里長征的本領，一氣跑到東三省，首先獲得了在東北的優越地位，破壞了開羅宣言和中蘇條約，因此造成今日的東北問題。由此可以看出這個中國軍隊是勇於內戰而怯於對外的。我們也難怪他怯於對外，因爲士兵的訓練太不夠了，軍隊的裝配太不現代化了，並且國軍也好，共軍也好，都沒有吃飽穿暖，所以既不能衛國，又不能保民。沒有吃的他們就要吃老百姓了。因此老百姓見了軍隊便頭痛。這種軍隊必須迅速加以改組和革新。所以我們認爲在戰後第一要着，就是趕快裁軍。中華民國是一個民國，不是一個軍國，更不應該成爲一個黨國，所以我們老百姓堅決反對有任何「黨軍」的存在。我們絕對不容許有黨軍的存在，就是反對以任何一黨的武力，而推行其一黨的偏見，強迫無階級的大多數民衆接受。中國的軍隊必須統一，合併爲新的國軍，根據政協的決議，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利用軍隊作政爭的工具，然後中國才能走上和平與民主的坦途。

中共代表周恩來先生最近表示：「國共爭端，如須友邦調解，只有依照杜魯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聲明及莫斯科三國公告原則下爲之。」我們非常贊同。

杜魯門總統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聲明有云：「獨立軍隊的存在，如像共產軍的存在，是與中國的政治統一相衝突的，並且實際上使中國的政治統一，成爲不可能的事。在擴大的舉國一致的政府成立之後，獨立的軍隊即應取消，中國的一切武裝力量應該有效的統編成爲中國的國家軍隊。」

這就是我們向來一貫主張的「軍隊國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辦法。關於政治民主化——擴大政府組織，容納各黨派及社會賢達，組成舉國一致的政府——之辦法，早經政協擬定了詳細辦法。現在所缺的，只是整編國軍的具體方案。所以我們希望中共能够以人民和國家爲重，速即使整軍計劃獲得協議，俾軍事的團結得以早日完成。軍事團結成功，政治的統一便有確實的保障。過去國共談判，每每觸礁於整軍的若干技術問題之上，我們希望這次國共雙方能在整軍方案上互有所讓步，以便促成整軍計劃的實現，確保中國永久的和平。

最近美國衆議院外委會討論援助中國革新軍隊及實施中國對聯合國義務一案，代理國務卿艾契生宣讀馬帥來電，並解釋該案的雙重意義爲（一）協助國共兩軍之合併；（二）編練效力勁強之軍隊，以便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得在遠東保持和平。國共兩軍應該感覺自身任務的重大，不僅在衛國保民，同時還有保持遠東和平的使命，以盡四強之一的責任。依照一月十日停戰協定，國軍縮編爲六十師，政府五十師，中共十師。這個比率，並不算壞。整編之後，配以美式裝備，與國軍平等待遇，我們相信中共的官兵，一定比現在更愉快而高興。

同時杜魯門總統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聲明中又說過：「美國認爲現在中國的國民政府是一黨的政府，美國深信中國之和平，統一，與民主改革要獲得保障，必須改革一黨訓政制度，容納各黨派，組成舉國一致的政府。」

我們一方希望中共能够同意馬帥的最後裁決權，一方希望政府能再作相當讓步，使整軍計劃早點實施，以便及早合併國共兩軍，成爲新國軍，同時立即實行政協決議，改組政府，以民主的統一，保障軍事的團結，那中國才會永久的和平。否則各方業已同意的方案，最後必須請示於延安，才能作最後的決定，那嗎，毛澤東先生不是馬歇爾和蔣主席的最後仲裁人嗎？我們希望大家相忍爲國，速即完成整軍計劃，以便開始建國工作。

勿以內爭牽涉外交 六月二十三日

現代國家，雖然各有其立國之道，但是必定各有一套定理爲全國人所共信共守，而莫敢踰越。如果有人敢於踰越，必定立遭國人的唾棄，而無以自存。在此等共信共守的定理之中，外交超越內爭，卽是其中之一種。凡是文明國家，其外交國策，莫不在朝野協商共定，一致擁護。祇有不自愛的民族，纔將外交問題牽入於內爭漩渦之中。

一國立國，有一定的國勢。在此一定的國勢之下，祇能有一種外交國策可循，並無第二條路可走。如果將外交牽入內爭，則甲所主張的，乙必反對；乙所執行的，甲必破壞。於是國策動搖，無法貫徹，必至外失國家的信用，內亂國民的信念，遺禍國家莫可比量。就我國的國勢說，我國家以敦睦邦交爲傳統的國策，我國民以愛護和平爲傳統的好尚，我經濟開發有待於友邦的援助，我地勢處於亞洲大陸之中央（某一意義之下中央），所以我國的外交國策是平等親善，不但對於各大國無所親疏厚薄於其間，便是毗鄰的各小國，我們亦是秉着善意以相周旋。根本無所謂親美，亦無所謂親蘇；更不應該有所謂反美，或有所謂反蘇。此等流行語，皆是內爭牽及外交的產物，根本應受國人的唾棄。

國與國相處，有無相通，是必然而且自然的事情。我所無者，須向有餘的國家取受。各國所餘之物不一，我之所餘，或爲甲國所有而爲乙國所無，我當然祇能向甲國取受之，而不能向乙國取受。於是在甲乙兩國之間，似乎有所親疏，其實絲毫無所厚薄。明白此理，便知中美關係比較中蘇關係深密，乃是由於歷史的關係，交通的關係，經濟的關係，文化傳統的關係所必然產生的結果，並不能說明中國人對蘇聯的友誼，不及對美國。如果因內爭的原故，而挑起蘇聯的反感，那是對於後代子孫犯下一種大罪惡。

將內爭牽涉到外交，最壞的現象，是參與內爭的勢力，各求一個外在的支援，藉外力的支援以從事國內的政爭。如西班牙的往事，即其顯明的實例；在殖民地開拓史中，此種實例，尤其衆多。如是鬥爭的結果，或則兩敗俱傷，漁人得利；或則一成一敗，而成者到底亦成俘虜；或則兩大外力利用己國的人命，以競雄爭長於己國領土之上，都是亡國殃民的結果。

內爭是內爭，外交是外交，萬不可糾纏不清。爲國家前途計，爲子孫禍福計，我們要求國人嚴格恪守此一原則：勿以內爭牽涉外交！

心理上的距離

六月二十三日

國共停戰談判，十五天已過去了，現在又延期八天。

過去十五天所成就的是什麼？我們很忠實的向讀者報告：一無成就，依然是一張白紙。這只要看中共向政府所提出的四點建議，便可明明白白。

可是，話雖如此，說沒有成就畢竟也還是有成就。經過了這十五天的折衝，兩方面的意見，在老百姓的眼中，總算已經是暴露無遺了。我們知道在這一次的談判中，兩方面沒有辯論是非，沒有高談理論，既沒有提到民主，更沒有顧慮到人民的意見，所商談的都是所謂實際問題。換言之，便是中共希望保留多少軍隊，政府可以允許中共保留多少軍隊；政府答應中共可駐兵在一些什麼地方，中共對政府所答應的，則還有許多不能同意。關於交通的用人行政以及護路等等，兩方面的差異之點，大致也是如此。像這樣推開窗子說亮話，絕不利用若干好聽的名辭以資掩蔽，總算是一種絕大的進步。

現在雖然又有了八天的猶豫，可是兩方面的距離，依然很遠。假定只有事實上的距離，即令是十分困難，總還不難找出一個解決的途徑；可怕的便是除掉事實上的距離，還有心理上的距離。

甲不信任乙，乙也不信任甲；甲懷疑乙要推倒甲，乙也懷疑甲要解決乙；由相互恐怖而相互猜忌，更由相互猜忌而相互設防，假定這種心理上的距離終於無法接近，我們對這最後八天的談判，依然是不敢提前樂觀的。

有什麼方法可使這兩方面的心理距離接近呢？這是最值得馬歇爾先生注意的。

誰在鼓勵中國內戰 六月二十四日

——並敬告莫斯科真理報——

法國新聞社莫斯科二十二日電，共產黨機關報真理報頃載稱：

「美國政府不顧及其所一再提供之諾言，仍將軍隊留駐中國，用意所在，顯係協助國民黨，從而干涉中國內政，鼓勵內戰。」

又據二十三日上海新民報晚刊南京專電云：

「中宣部二十二日招待記者時，並將杜聿明長官寄來中共佔有長春時所發行之「東北日本新聞」與衆傳觀，內稱：「長春之役，中共戰車部隊，全部爲被俘虜後新行釋放之日軍，自稱一兵一卒，均係精選，武器與數量，與美式裝備之渝軍比較，毫無遜色。」云。」

前面兩個消息，正是針鋒相對，中共的戰車是怎樣來的？究竟誰在鼓勵中國內戰？

我們希望任何友邦，都能恪守莫斯科三國公告的原則，言行一致的實行不干涉中國內政，趕快把染指的手收回去，以敦邦交而維國際和平。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中國人自愛自重，在戰前，並沒有美軍駐在中國，國共也曾互鬥了十年。所以我們尤其盼望國共雙方首先自動懸崖勒馬，各自縮手，推誠協商，共維和平，以免引起國際糾紛，使戰後中國更演西班牙的悲劇。

國軍，根據中蘇條約，有要求蘇軍予以便利及援助，以便接受東北日軍投降及進行接收工作之權。但是政府運兵到大連營口，先後均遭蘇聯拒絕。拖延時日的結果，共軍便由煙台和威海衛等海口用不船運兵往東北，數達二十餘萬之衆，以東北本無共軍之地，乃一旦人數十倍於國軍，不是得了特殊便利和援助，怎能辦到。且蘇軍南退，共軍即佔領長春和哈爾濱，中共在東北所使用的日本武器，來自何方，那是一個公開的祕密，爲東北婦孺皆知的事？陳納德將軍會明白的告記者說：蘇方接濟了中共的軍火。究竟誰在鼓勵中國內戰？

美軍在中國留駐的任務，是在協助國軍解除日軍武裝，並遣送日僑返國。最近日軍參加長春之役，助共軍打國軍，敵人還留在東北助長中國的內戰，這更證明美軍在華的任務尙未完成。日本人向來初於中國內戰，過去促成北洋軍閥火併以坐收漁人之利，現在又樂得助長國共火併及美蘇衝突，以便乘機復興，乘機再起。這是全體聯合國所絕對不能容忍的事，不僅英美中蘇而已。

過去赫爾利將軍返華途中，曾道出莫斯科，會晤史達林元帥，據云史達林表示：「希望中國成爲一個統一的，民主的，繁榮強盛的國家，蘇聯與美國是一致的」。

在抗戰初期，蘇聯給我們的援助最多；在抗戰末期，美國給我們的援助最多，我們對美蘇的友誼援助，是同樣感激的。

在莫斯科危急的時候，英美決定在太平洋採退却政策，深深加重了中國的壓迫，但是中國在當時，爲盟友犧牲一切，絕對沒有懷一念私心，沒有說過一句話批評英美所給蘇聯的飛機大砲和坦克太多。中國政府對「打倒納粹第一」的戰略，也未嘗提出任何抗議。美軍在解放歐洲後，最後才實行援華作戰，最後出來的兵士，當然是應該最後回去的，在任務最後完成的時候。戰後世界，需要和平的，實莫過於中蘇兩國，因爲我們兩國的犧牲最大，而中國自九一八以來，過了十五年的國難，尤其急切的需要和平建設與民主統一。就是依照馬歇爾，貝爾納斯的法案（正在美國國會討論），援助中國

整軍，留一千美軍暫駐中國，協助整軍工作，也絕對不會威脅到友邦蘇聯的安全。依據莫斯科三國公告的指示，完成了政治民主化的工作之後，再依照馬歇爾，貝爾納斯法案完成了軍隊國家化的工作之後，那在民主統一的，舉國一致的，超黨派的新中國政府統帥下的五十師新國軍，也絕對不會成爲蘇聯安全的威脅，相反的，他會成爲中蘇友好關係最有力的一種保障。

我們希望在國共談判期間，我們的友邦任何報紙，再不要從事宣傳戰，以免刺激任何一方的感情，更加深兩方心理上的距離，使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的工作，不易達成任務；這是我們所馨香禱祝的！

整軍應當祇是一個技術問題

六月二十六日

整軍方案的談判，政府與共黨兩方面都嚴守秘密。我們佔在老百姓的立場，雖然不能承認事不干己；但是因爲希望其進行迅速而順利，也就信託兩方面都有謀國的誠意和識量，所以我們很少發言。無疑的，談判的癥結始終是在整軍問題。談判無論如何延長，波折無論如何離奇，歸根到底，無非是由於兩方面對於將來的軍隊統率問題懷抱着根本不同的見解。儘管幌子多，打開窗子說亮話，自始至終，無非一個軍隊問題在那里作祟。

照老百姓的看法，整軍的目的，很顯然的，不外三點。第一、是縮減兵額，減少國庫的負擔，從而亦就減輕人民的負擔，讓人民能喘一口氣。這是從經濟的觀點看。第二、整軍是要實行精兵主義，用新式的訓練，精良的裝備，以建立現代化的國防軍，一以保護本國的安全，一以與友邦共維世界的和平。這是從國防的觀點看。第三、整軍是要消弭一個國家有兩個軍令系統威脅國內的和平，妨礙國家的建設，使國家的一切設施，不能現代化。整軍的目的就是要統一軍隊的編制，訓練和指揮，以完

成現代化國家的體制。這是從建國的觀點看。

我們老百姓，對於整軍的看法，祇有這三種。至於什麼軍隊數額的比例，軍隊結集的單位，軍隊駐防的地區，軍隊駐地的行政等等，至多亦不過是一些技術問題，假使沒有私意存於其間，決不會商量十月之久，還是「議而不決」。所以這一點，是應當加以譴責的——雖然因為祕密談判的原因，我們不明白談判的過程，我們總覺得談判整軍未能依據它所應有的目的，總是在技術上繞圈子。

談到軍隊數額的比例，我們老百姓，實在不感興趣。同是國家的軍隊（在整編後），為什麼一定要爭論政府軍要留多少師，共產軍要留多少師，募來的兵，實行汰弱留強；抽來的兵，按照年次分別復員。整軍的技術，應當依照這兩個原則，同樣實行於政府軍和共產軍，誰能剩餘多少就是多少。如果先定一個比例，何異於在開步走的時候，就命定了背道而馳呢！

軍隊結集的單位問題，就是在一個軍區的最高長官之下，他所能統率的軍隊的數量問題。我們不是軍事專家，但是照常識判斷，在平時，陸軍的建制是應當以師為最高單位的；師以上的編制，都是作戰的編制。如果在平時讓一個軍官統率的軍隊太多，必定難免跋扈恣睢，甚且擁兵自衛，尾大不掉。所以整軍時，軍隊結集的最大單位應該是師，如有師以上的統兵官，就是製造割據。

軍隊駐防的地區問題，應當祇是一些技術問題，不應該夾雜着政治問題，更不應該夾雜着外交問題。所謂技術問題，例如慣耐風寒的軍隊宜駐北方，慣耐潮濕的軍隊宜駐南方，這些是應該講究的。至於駐地須顧及部隊的安全或外國人的情感，都是變態的心理，不當存在。

軍隊駐地的行政，照理講，軍隊不當干涉行政。但是還不够，必須駐軍不支持當地政權以壓迫人民，人民才不至受政權的虐待。共產黨的想法，我們敢冒昧的說，是想：中共軍隊駐在地，即是中共政權所及處。我們老實說，老百姓所怕的，就是這一點；因為共產黨統治區內，還是盛行着「鬥爭」，還是盛行着「肅反」呢！有位東北朋友說：東北人可憐，對抗日本，東北人長期受苦；妥協中共，

東北人又受犧牲。在共產區內，實在沒有人民的自由，所以老百姓怕。

整軍根本是一個技術問題，不應當成爲政治問題。使整軍成爲政治問題的此一作風，應當加以譴責。如果單從技術上談整軍，至多三個鐘頭便可辦了！拖！拖！拖！萬惡之母！

自由經濟與平抑物價 六月二十七日

自從抗戰以後，因爲軍費浩繁，貨幣膨脹的關係，從二十九年年起，物價突然上漲，以後累年增加，突飛猛進，至今未已，這期間，政府也會用盡種種方法，希圖管制物價，但是不問你採取何種方法，物價依然上漲不已，不管制還好，越管制越糟，從二十九年到三十五年，這六年間政府對於物價管制的失敗，就證明了統制經濟政策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爲什麼在他國可以實行的統制經濟政策，來到中國就着着失敗？我們須要明瞭各個的背景不同，在歐美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平常一切經濟事業都已經組織化過，全國的經濟命脈有十分之七八操於幾個大公司，大工廠之手，這些公司工廠，其組織之龐大，部門之繁多，不亞於一個小王國，因此政府如欲實行統制干涉政策，只要把這幾個大公司工廠的首腦部看管好了，一聲號令下去，便可以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這就好比一師軍隊，先已經編成了若干團，然後成立師部，指揮自然靈敏。中國的社會則不然，不但根本沒有像歐美那樣規模龐大的工商組織，就是像樣一點的公司，工廠也寥若晨星，全國的工業還留滯在手工業的時代，全國的商業，還握在成千萬的小商店之手，全國的主要物資，還分散在農村，在田園倉庫之中，這就像一師軍隊，連團營連排都沒有成立，單靠師部發號施令，所指揮的是一個個單獨的士兵，請問這命令如何執行法？這就無怪於政府統制經濟政策的連番失敗了。

要避免這種失敗，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國家資本主義的路，仿蘇聯的辦法，索性把一切私人工商企業都打倒，一切國產，國製，國營，國銷，政府現行的政策，似乎是想往這條路上走，什麼中紡公司，中蠶公司之類，都是這一套作風，祇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表面上似乎政府可以吃乾一切，但是我們要知道，在別的產業發達的國家，政府要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不過是把這幾個大工商企業組織接收過去，並不必另起爐灶，這就好比別人已經編成了一團團的軍隊，政府只要把他接收過來，改編一下，就不難造成一師勁旅；即使如此，英國現在的工黨內閣，還在緩之又緩，慎之又慎，像中國，根本還沒有大工商企業的基礎，政府要辦理一切國營事業，必須從頭辦起，好比練兵從一個個士兵練起一樣，這是何等繁難，何況中國這些經濟軍官，又多是官僚出身，祇知道假公濟私，那裏能涓滴歸公，因此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結果，不過是替官僚造機會，促成了官僚獨佔的資本主義，即資本主義的最惡劣形式，人民固然大受其殃，國家也未必有什麼利益可圖，民間經濟日益破產，結果必致國家的稅收日益減低，財政基礎動搖，物價膨漲，預算增加，不得不更靠發行紙幣以維持政府財政，結果造成循環的惡化。伊索寓言中的愚人，嫌金鵝一天生一個金蛋不痛快，殺鵝而取蛋，結果鵝亡而蛋盡，現在政府的經濟政策，正是這種殺鵝取卵的愚笨作法。

另一條路，是自由經濟的路，我們認為這才是中國今日唯一可行之路，自由經濟唯一的流弊，是恐怕私人資本壟斷一切，但中國今天沒有這樣大本錢的資本家，不必怕。反之，在目前這種中小工商企業分布的中國社會，自由經濟的政策可以促進中小工商業間的自由競爭，自由競爭的結果，每一個工商單位，必須簡化產銷程序，改良技術，減低成本，貶損價格，才能與他人競爭，而大家相互競貶價格的時候，物價自然低落，物價低落的結果使成本減低，產量增加，又可刺激物價使更趨低落，物價低落的結果，表面上似乎工商業吃虧，實際上成本減低，社會購買力增加，工商業更可欣欣向榮，而國家稅收自然增加，預算自然減少，通貨得以收縮，財政基礎漸可走上正軌，物價自更形低落，國

家也並不吃虧。至於採用自由經濟的政策，或慮外貨將大量傾銷，中國落後的工商業將無法立足，不知外貨傾銷的結果，受其害者僅在某一業，而蒙其利者實在全國。譬如說，外國汽車大量輸入中國，卡車低到一萬塊法幣一輛，固然中國的汽車製造工廠必須破產，但汽車廉價的大量輸入，將使運輸成本大大減低，經濟越法流通，百業都可減少成本，物價和工資，普遍即可下落，新興的中國汽車製造業，憑藉低廉的成本，自然也又還可以再拾起頭來，與外國同業競爭。自由經濟好比放水自流，流來流去，自然會走到平面，統制經濟好比築堤防水，堤越築得高，一旦潰決起來，水患越大。

本月二十四日本市中央日報的地方通訊欄中，曾載有下列一段新聞：

如此便宜

六浦汽車競爭營業

連日互相減售票價

（六合通訊）浦（浦口）六（六合）長途汽車公司，在浦六公路行駛汽車，已將三月，原售票票每人一千元，迭次漲價至二千五百元，前日（十九）又由京來一東方汽車運輸公司，亦售票票，第一天售價亦賣二千五百元，第二天則減價二千元，今晨（十九）浦六汽車公司，亦大減價，每客票價祇售一千五百元，兩汽車公司連日互相減售票價，乘客便宜不少。又聞現每日開班，來往三次，比前多增一班。

請看，這就是自由競爭的經濟政策，可使物價低落的事實證據。

新聞自由與民主和平

六月二十八日

在今日各國人民所喚的民主口號之中，有一個是比較不大為人所重視而實際却異常緊要，而為民

主進步與世界和平所絕對不可缺少的，就是「新聞自由」。

因爲現在是一個新詭辯時代，一班受過特殊「宣傳戰」和「神經戰」的訓練的人，往往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最壞的說成最好的，把最好的貶爲最壞的；黑的可以變爲紅的，白的也可以變成黑的；明明是侵略，偏要說是自衛，明明是自衛，可以被指爲「破壞邦交」；本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式的獨裁，可以搖身一變成爲唯一無二的民主，原是比较民主的國家，反被誣爲變相的法西斯獨裁；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於是一班專以造謠爲職業者說的話，固然照例的被人當話，就是說的眞話，老實話，漸漸的也無人肯信了。在長期的受騙之下，「人們所得的教訓太多了，遇事懷疑幾乎成了本能的反應。如果此風不改，在不久的將來，恐怕任何人說的話，都再不會有人相信，而且根本就無人肯聽了。

話既無憑，看說話的人愛怎樣說就怎樣說，這樣的話自然無人肯信，所以要人家相信你的話，必須你的話有事實的根據，不是在成見上建立起來的空中樓閣。然而以今日世界之大，各國政教風俗之複雜，一個人的話是否合於事實，亦正難於判斷。因此新聞自由就成爲絕對必要的了。

其次，一個國家如果在某些方面，對外保守着完全的祕密，不肯向人公開，這是極危險的。一方面人民缺少與外國文化交流的機會，容易養成夜郎自大頑固不化的心理，以爲本國的有百是而無一非，人家的有百非而無一是，這在國際合作上引起多大的障礙！一方面野心的國家往往暗中積極進行擴軍，等到軍備完成，外國警覺，而戰事已無法制止。所以爲了國際的和平合作，新聞自由更絕對不容忽視。

新聞自由在對內對外的關係上既有如此的功用，無怪乎它在美國憲法上成爲補充條文第一條的主題，而在人權宣言中的地位，也僅次於宗教的自由。在此次大戰中，新聞自由的呼聲顯然更普遍了，可惜至今尙未獲世界各國一致的採行。

所謂新聞自由，包括採訪自由，發表自由和批評自由三者；詳言之，一個國家應准許記者自由採取事實，並將事實公開告訴人民，同時對於與人民有關的政策，問題和人物，又准他自由批評，不加阻礙。固然，記者的批評也得不得越過誹謗法的範圍以外，否則濫用自由，自然也有弊病。但就是出了誹謗案件，像有些國家的法院（如美國），還是時常傾向於偏袒報紙的發行人，這不失為一種值得讚美的尊重新聞自由的措置。監督報紙應該是人民的職責。

我們以為新聞自由之採行，實為今日刻不容緩之事。一方面貪污腐敗的政治需要新聞自由來廓清，一方面像有些區域（如蘇北及其他所謂解放區），尤其需要大批的中外記者去實地觀察，究竟在那些區域以內，人民的一切基本權利是否比政府統治之下更無保障？人民的經濟生活是否比政府統治之下更為苦痛？一切農工業的生產效率是否比政府統治之下更形低降？這些是是非非黑黑白白，都是當前國人所急欲知道的。

有人說，新聞自由並不能作民主的尺度，像蘇聯式的國家，壓根兒就沒有新聞自由，而且認客觀報導就是賣國賊，但仍不失為民主。對於這個說法，我們的答覆是：民主主義是建築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原則上，蘇聯人既不是神，也不是猴子，彼此的理性決無多大的出入。如果說客觀的報導就是賣國賊，難道撒謊才是愛國，才是民主嗎？怪不得有人要以為愈壓迫人民的自由，便愈民主，愈能造謠便愈民主，甚至殺人愈多便愈民主了。可見這種詭辯是不能成立的。

現代的心理學告訴我們：只有內心有缺陷的人，才怕人家去接近他，同時他的誇大的宣傳正是用來掩飾他內心的缺陷的。因此，除了戰時以外，任何限制新聞自由的理由都是不光明的，而且自暴其弱點。

我們要以科學的態度，發動廣大的新聞自由運動，去實地考驗一切帶有神祕性的人物，勢力，區域，和國家！

誰破壞新聞自由，誰就是反民主，誰就是反和平。

勿用青年作工具 七月一日

現在的教師對於學生，成年人對於青年人，多半有一種殘酷態度，其顯著的表現，便是以學生作工具，犧牲學生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小之是自己飯碗的保持，大之是自己派系勢力的擴張，更大之，就是政權的奪取。凡此，都不是尊重青年的人格，愛護青年的利益；相反的，正是「長輩不仁，以後生為芻狗」。我們為略盡成年人道義上的責任計，不能不喚起青年人的警覺，亦不得不促起成年人的反省。

不錯，青年人是國家的支柱；青年人對於國事應當具有責任心。但是青年這個名辭的含義很廣，尚未成丁的學生，亦可包含在青年一詞之內。就學生之為學生說，無論如何，畢竟是在學習時代；既是在學習時代，當然，他的知識便未充實，他的閱歷便未豐富，所以他的能力還不足以擔當國事，硬將國事的責任放在青年身上，確實是一種摧殘青年的舉動。誠然，中國今日受過高中以上的教育的人，為數不多，青年學生如果不負起國事的責任，更有何人能負責任？此種說法，似乎有理，其實大謬不然。第一，唯其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很少，所以對於此輩正受高等教育的人們，就應當特別愛惜，不可輕於犧牲。第二，人才的圓滿成熟，是需要一定的時間的，如果提前使用，則不能盡其才，而成為重大的損失。現今人才的零落，正由於近五十年來，無時不在提前使用人才之中。「大器晚成」，對於在校學生而提前使用，既對不起國家，又辜負了青年，應當改弦易轍。

有人說：參加實際活動，正是絕好的教育，「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那種公式的教育，決不能與「活教育」相提並論。這種見解，本是一種古老的見解，子路所謂的「有人民焉，有社稷焉，何

必讀書，然後爲學」，正是「從行動中去學習」的有力號召，遠在美國哲人杜威以前。我們對於杜威的此一學說，第一、當知其用意在於打破「教條式的演繹」作風，遇事使用一定的公式以事解決，絕不考察實際的情形與公式是否相合。此種作風，論事既不能恰到好處，治學又不能發現真知，杜威有感於此，所以教人多重視自身的經驗，少管空闊的教條。第二、人類對於任何道理的了解，都必須從自身的經驗上求得印證，其了解才能够真切活潑，而不是「學人言語」，「道聽塗說」。杜威教人多作活動，乃是欲人多有些親身的經驗，以爲了解高深道理的憑藉。杜威學說的價值，我們並不否認。

不過杜威並沒說過：一切知識，單靠實際的活動，便能學習得來。相反的，愈高深的知識，便與實際活動隔離愈遠，愈複雜的知識，便與實際活動隔離愈遠。這一點，是杜威的信徒們所未會注意的，而事情的要點正在此處。例如經濟問題或財政問題，若不運用繁複的系統的知識，而單靠「從行動中去學習」，欲得到問題的解決，真是俟河之清。淺薄的試驗，已經殺死了千萬的人民，阻礙了國家的進步五十年！我們必須拋棄「從行動中去學習」這一口號。

青年是純潔的。正因爲純潔，所以容易爲人所利用。利用人家的純潔，固然可惡；而自恃純潔，亦復可笑。因爲純潔祇是一個成功的前提條件，純潔的本身並不能成就任何事業。成就事業的，是知識，是系統的知識，是精深的知識。建國所需要的，是知識，是系統的知識，是精深的知識。在破壞時代，純潔的犧牲，至可寶貴。於今破壞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是建國時代，建國需要知識。愛國青年，當埋頭求知。

青年諸君！想要利用君等作工具的人，不止一種，君等都得小心警戒。凡是教君等離開求學崗位的，或是教君等從事破壞的，或是教君等仇恨別人的，君等都要當心。君等是「國家之寶」，君等當自愛！——莫讓他人用作工具！

再論美國援華政策 七月三日

——並答「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

合衆社一日紐約電云：「爭取民主的遠東政策委員會」今日發表文告，呼籲國會否決「美國援華整軍案」。這個委員會當中，有施坦恩，佛爾曼，及沙利斯伯里等。他們反對的理由，可以歸納爲下列各點：（一）此案違反杜魯門總統去年十二月的聲明；（二）中國現在不獨未走向和平統一之路，相反的是在大規模內戰的前夕；（三）大部分中國人均反對此案將侵犯中國主權；（四）此案將給總統以平時所未有之特權，使他在後十年間有決定國策之特權；（五）此案使美國享有聯合國所獨有的特權。

每日工人報社評亦批評助理國務卿艾契生最近所說明的美國政策爲反民主的，並謂「今日中國政府，爲傾向法西斯的軍人所操縱，這派人物是希望中國打內戰的」。

這上面的兩種言論，和莫斯科真理報的論調及延安聲明可謂若合符節，真有東西輝映之妙。

紐約時報六月三十日社論云：「艾契生於此時解釋美國陸戰隊在華之任務，爲何極爲適當，因爲如艾氏所言，吾人承認國民政府爲中國惟一合法政府。吾人確曾以吾人之力，使該政府按照民主路線擴大其基礎。中國能愈早獲得統一與和平，如是美國之陸戰隊即可撤退，則美國人亦愈感欣悅」。我們認爲紐約時報的論調，是切合事實的。我們在艾契生首次提出此案於衆院外委會時，即首先表示我們對美國援華整軍這個法案是極端贊成與歡迎的。積極的理由，我們曾經一再詳細申述過，現在祇就美國所謂「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反對此案的論點，加以嚴正的批評。

（一）杜魯門總統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對華政策聲明中，曾經說過：「獨立軍隊的存在

，如共產軍的存在，是有礙於中國的政治統一的。」又云：「一個分裂的中國，就是遠東及世界和平的威脅。」最近國務院所提出的援華整軍案，就是要把國共兩軍合併，把中國現有的三百多師縮編爲六十個師，先予以超黨派的新式訓練，再配給以現代化的裝備，使成爲强有力的統一的民主的新國軍，內保國內和平，外禦未來的侵略，以確保遠東和平。這正是杜魯門總統在忠實的執行去年十二月所聲明的援華政策。

(二) 正因爲中國現正面臨大規模內戰的前夕，尙未走上和平統一之路，所以美國纔特別要援助中國，使他迅速完成和平統一，實現民主團結，才能負起聯合國保衛戰後和平的責任與義務。因爲最足以阻礙中國和平統一與民主建設者，就是黨軍的對立和新舊軍閥的割據自雄，置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於不顧，他們爲了自身的利益，可以採用一切手段，包括內戰在內，爭權奪利，打得你死我活，不惜以人民爲犧牲品。所以要恢復及確保戰後中國的和平，必須立即整編與統編中國軍隊，第一步，國共兩軍及地方部隊分別縮編，第二步混合統編組成一個超黨派的新國軍。解放後的比利時和法蘭西的國內和平之恢復，就是整編五花八門的地下軍爲新國軍而完成軍事統一以確保政治統一的結果。而且中國整軍方案，早經政協軍事組議妥，現在馬帥居間促其實現，在技術上雖遇到若干困難，不能成爲我們反對整軍的理由。

(三) 美國援華整軍，將侵犯中國主權之說，這似乎是而非的論調。首先莫斯科真理報曾有此論，繼之延安聲明亦有此說。最近蘇聯忽然一變其對阿根廷的政策，與貝雅總統恢復外交關係，莫斯科電台近來也時常廣播，攻擊杜魯門總統與拉丁美洲軍事合作的計劃，說「杜魯門總統的計劃，是美國帝國主義向外擴張的另一工具」。莫斯科電台也說拉丁美洲的大衆反對杜魯門的計劃，並轉播阿根廷「辯論報」的評論，說「杜魯門建議，是北美帝國主義欲使南美變成他的根據地和砲灰來源的一種企圖」。而美國國務院官員則認爲蘇聯之承認阿根廷，其目的有二：(一) 予美國政策以一個有效的反

抗；(二)爲蘇聯在拉丁美洲建立一個堅強的基地，英美兩國在外長會議中提議，蘇軍及聯軍均由奧國撤退，遭蘇聯拒絕，又提議允許奧軍提早成立民主政府，亦被蘇聯拒絕，要求蘇聯減少駐奧軍隊（蘇軍駐奧者最多），又被拒絕，請問貧弱不堪的戰敗國奧地利有什麼力量可以威脅蘇聯的安全，而有維持那樣龐大駐軍的必要呢？除了奧國的共產黨勢力尙未長大，還有待於胎育，以便與勢力比較雄厚的社會黨抗衡外，還有怎麼其他的理由呢？

現在美國所以繼續軍事援華的惟一理由，就是因爲美國對聯合國的責任，尙未完全履行。我們知道，在過去英蘇兩國所以能够轉敗爲勝，反守爲攻，轉弱爲強，轉危爲安者，除了他種條件外，最主要的的原因，就是美國軍事援英援蘇的結果。美國和英國的大批飛機，大砲，和坦克送往蘇聯，紅軍並不會使用，所以英美兩國同時派了許多軍事專家前往蘇聯予紅軍以新技術的訓練，然後蘇聯才能發動驚人的反攻，直搗柏林，掃蕩納粹。在蘇聯獲救與復蘇之際，正是中國深受敵人封鎖軍事逆轉之時，我們爲盟友犧牲一切，毫無怨言，對英美首先援蘇，也毫無嫉妒之念。今天日寇投降已將屆滿一年，而日本俘虜及僑民，尙未完全遣送回國，就是因爲中國國軍的配備太壞，在勝利前夕，沒有獲得美國充分的接濟，未能發動大舉的反攻，如像紅軍在東歐之所爲，所以使共軍在若干地帶獲得了日軍的精良武器，有所資以從事大規模的內戰。據最近青島歸客談稱，不僅共軍的炮隊是日本軍官在指揮，連共軍的戰略，也是穩紮穩打，襲日軍之故技。所以中國再繼續像這樣內戰下去，可說是爲敵寇復仇，抗敵先烈有知，何以瞑目於地下？

中國軍隊必須統一，必須現代化，所以我們有接受美國援助的必要。在戰後要維持遠東和平，中國也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勁旅，所以美國也有援華整軍的必要。這是一個聯合國對另一聯合國所必須盡的一種責任和義務，無所謂主權不主權。如以主權論，英蘇及其他聯合國有接受美國援助之權，我們中國也應該同樣享有此種權利。

(四) 至於這個法案將授杜魯門以十年的特權，爲美國平時所未有，這只看這個特權是否有裨於和平與正義。過去美國爲援英援蘇曾授羅斯福以特權，現在爲促成中國的民主統一與確保遠東和平，爲什麼不可授杜魯門以同樣的特權？

(五) 此案使美國享有聯合國的特權，更不能成爲反對的理由。因爲促成中國民主統一，早有莫斯科三國會議公告，成立基本原則，這只是聯合國的一種義務和責任，並不能認爲是一種特權。美國以聯合國精神領袖的資格，曾經援助英蘇法及其他一切聯合國獲得解放於前，爲什麼不能援華整軍，促成中國的和平統一和遠東的安定於後？中國抗戰八年，犧牲最大，受苦最深，而獲得聯合國的援助和救濟也最遲，最近美國援華之提出，只可說是美國補盡其所應盡的一種義務而已，美國及聯合國友人不獨沒有理由可以反對，並且應該敦促其及早實行！

國大召開的再決定

七月五日

本月三日，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國民大會定十一月十二日召開。

本來國民大會的召集，原定在本年的五月五日，後經政協綜合小組一至協議延期，當經政府照辦，雖經當時一部分到京報到的代表反對，延期之議，並未變更。可是政協雖協議延期，究竟多久，却無明文規定。從五月五日算起，到十一月十二日，總算延期了半年以上。單就這一點而國防最高委員會的決定與政協的協議，是沒有什麼衝突的。

我們二十年來一貫的立場，便是反對一黨專政，積極的要求有一部合乎民主原則的憲法產生。我們認定不能如此，則一切紛紛擾擾的現象，即將無法結束。

以目前的事實而論，國共兩黨正在直接談判，所商量的是全國整軍問題，駐軍的地點問題，全

交通的恢復與管理問題，此何等大事，可是除掉國共兩方私相授受而外，到底有不有一個真正的人口代表可以空喙！這是不是合乎民主的精神？兩方面的心目中，究竟有不有所謂人民者存在？

老實說：一黨專政我們已經受不了，難道由兩個黨來分裂天下，宰割山河，我們便受得了嗎？我們不能贊成由任何一個黨派所壟斷的國民大會，我們也不能同意一部反乎民主原則的成文憲法，我們尤其不能苟同因為少數數人的糾纏不清，而聽憑一黨專政無限期的延長下去！

因此之故，國民大會的召開，在原則上是我們所不反對的，但在召開以前，協商依然不可少商什麼？協商代表名額的分配與補充；協商憲章內容的假決定；協商國大召開以前的政府改組；一個可以接近憲政的共同施政綱領；協商根絕一切壓迫人民基本自由的事實，發動於國民黨一方面要根絕，發動於共產黨一方面的也要根絕。

在這裏，我們要促起全國老百姓的覺醒：即令這次的國大代表依然去理想甚遠，但有一個具有規模的民意機關，畢竟比較讓政府少數人去獨斷獨行的來得好；即令只有十個二十個代表可以為人民說話，到底比較現在連一個也沒有要好得多；在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還相當遙遠，可是有一個可以學習民主的機會，却不可輕於放棄。

同時，我們也要促起政府的注意：召集國民大會，通過一部憲法，這是國家的百年大計，無論如何，總以做到各方都能參加為最圓滿，即令就有人不願來，在政府的立場，還是要委曲求全，做到淋漓盡致為最妥善，否則終於是一種遺憾。

最後，我們對中國共產黨也有一種期待：期待改變「拖」的方針。就現在內外一般的情勢看，拖自然可能使政府受到不良的影響，但不一定便可把政府完全拖垮，政府有可垮的因素，也有她不容易垮的因素，假定拖垮政府的目的達不到，而先把老百姓拖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這不一定對中共便有益；同時在拖的過程中，使得外國的勢力在中國無限制的伸張，使得國際的猜疑更增加其尖銳，等

到最後算總帳，中共也並無切實的把握。還不如把當前一切治標的問題從速了結，大家共同來解決治本的問題要好得多。

我們對國大召開的再決定，其大體的感情如是，至於一切細節，當然還要繼續考慮。

完成建國大業不能一日無理想

七月七日

——抗戰建國九週年紀念日感言——

今天是勝利後的第一個抗戰建國紀念日。八年抗戰，國民流血流汗，是一件極其艱鉅的工作，恢復和平，重建國家，更是最易激動希望的一件事體，依照情理，我們全國國民在今天應該具備悲喜交集的情緒，一面痛定思痛，不忘前車，一面歡欣鼓舞，奮發有為，要自矢以完成建國大業為己任，恢宏八年來死難軍民的遺志，創造國家民族更偉大的新生。因為必須如是，抗戰的破壞與犧牲，才算是有了代價，不是無意義的白費！不幸得很，勝利以後十個月來的時光，國內各方面的表現，一步緊一步的惡化，顯然走上與希望相背馳的絕途，一個「和平建國」的口號雖經朝野各方揭櫫出來，但直至今日，不特說不上「建國」的話，而且也根本看不見「和平」的面貌，國共兩黨的鬥爭，仍然各以武力為後盾，廣大民意的要求，發生不了挽救狂瀾的作用。於是烽火遍地，破殘益甚，瘡痍滿目，奄奄垂斃，事實上國家元氣凋喪到如此地步，而長期協議，又故作惺惺之態，此翻彼覆，不得結果。這種一上一下，一陰一陽，一軟一硬的作風，好似發瘧，非將奄奄一息的病人之整個血球破壞罄盡不止！到了今天，由此發生出來的流弊和影響，着實不小，別的不用談，最顯明的一種病態，就是卑劣的現實主義的風氣，澈底摧毀了高尚的理想！全國澈上澈下，不管口頭上是如何的談法，其潛意識裏布滿了黯淡的陰雲，固無新的希望，如卽有之，此時此地，亦復掀動吸引不起大眾企求的熱情，高尚的鬥

戶，既爲荆棘所阻塞，疲敝之餘，墮性勢力，遂不得不趨於猖獗之一途。人人感覺前途光明之渺茫，灰心失意，找不着一個安身立命之所，大勢所趨，順理成章的，自然必流於淺薄的物慾滿足。但在今天我們這個貧困混亂的國度，滿足物慾亦屬不易，於是由於自私自利的根性，不知又演出多少巧取豪奪的罪惡來！

就國家現勢。加以觀察，以言政治，則「不要理想，只顧現實」的作風，早已在多方面發生了領導的影響。共產黨「爭地方不爭中央，爭軍事不爭政治」的策略，一貫執行，未見放棄；政府當局高調施民主，革新政治，外鬆內緊，同樣缺乏真實的成績。目前若斷若續的國共商談，並不及於建國理想，民生大計，徒斤斤於槍桿地方之保持，有目共覩，其作風都嫌太重現實。至於內政吏治，共軍駐紮區域，人民生命財產有無保證？固不待說；即以國府還都以來而論，亦已兩月，整飭官方之令，雖然頒頒，可是貪污之風並未稍殺，所謂糧食貪污案，所謂路局舞弊案，層見迭出，尙無正當懲處，又怎能不使人民懷疑到政府統治的能力？

又如安定社會，振興產業，實爲和平建國之基本條件。在目前，社會的動盪不甯，民族工商業的毀壞，所有政治問題的影響固然很大，但政府是否已盡其最大最後的努力，恐當局亦未有此確信。通貨膨脹，物價高昂，交通梗阻，商旅裹足，外貨充斥，工業倒塌，這一切一切，既造成民生的憔悴，而尋不着出路的游資，羣趨於投機之一途，推波助瀾，爲禍愈深。加以官僚資本，壟斷利權，神聖尊嚴之國家，竟成爲少數特權者發財賺錢的工具，這種情形不特大大有背於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亦可說是一種對國民的不公平的榨取，根本談不上經濟政策，這種只顧目前，不計後果的現實作法，要想達到建國的目的，自然也是走不通的。

再拿教育文化事業來說，依我們民族的傳統，至少不應該也投降在現實主義之下，然而今天一樣不免。勝利以後，廣大從事教育文化事業的工作人員，啼飢號寒，爲人輕視，其境遇仍無異於戰時，

或更爲劣。大學教授的薪給，不及一國營機關的工役，政府熟視無覩，不予調整，而口口聲聲「尊師尊師」，不知有何意義？而有類乞討之募捐運動，成績既不甚佳，徒予社會一惡劣之印象。師道尊嚴，掃地以盡，亦無異投下巨彈，擊毀民族智慧所繫的高貴理想，讓卑劣的現實主義的橫流，更進而污沒了最後一道精神堡壘的牆壁！所以今天在教育界裏，讀書風氣是日漸低落，尙未畢業的學生，往往則已嫻於鑽營門路，應付人事的技倆。國家的新生命，乃寄托於此繼續繩繩的在學青年的身上，然而未離校門，壞風惡俗，早已從而蛀之。誰使爲之？誰會致之？這更是從事建國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總之，我們今天的中國，各方面所顯露出來的情形，是麻木，是萎弱，是癱軟，無積極的開創精神，並完全失去了高尚的理想。一切因循敷衍，得過且過，通通做了卑劣的現實主義的奴隸。這種危機，日益顯露，長此下去，若不更張，惟有崩潰沉淪，那裏還能談完成建國大業？所以我們遇着今天這個富有偉大意義的紀念日子，痛念過去抗戰時犧牲之慘重，絕不忍五千年文明大國，其光榮的歷史，反因勝利後召來墮性的斲傷，而致凋喪中斷。所以我們熱誠盼望全國同胞，一致警覺，共同努力：

第一、提高民族智慧，追求建國理想，建國理想應爲全國上下精神思慮之所寄，一切活動，一切作爲，必須歸趨此最高目標之達成。

第二、建國大業，經緯萬端，固不可故步自封，亦不可純恃外力，一切當謀自力創造，自身汗血所澆溉之花朵，其形色必更美麗光輝。

第三、自私自利之企圖，爲崩離社會生活之毒素；放棄理想，只顧現實，此種安於固陋之作風，尤爲開明進步之大敵，今日如謀完成建國大業，必須一心一德，羣策羣力，克此頑敵，清除毒氣！

客觀的中國國際地位 七月九日

七月二十九日準備在巴黎召集的和平會議，中國邀請國的資格忽然被剝奪了。主張拒絕中國作邀請國的是我們的盟邦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先生；始而不贊成，卒至『不能不』妥協的是美國；英法兩國在歐洲的地位可以舉足輕重，尤以英國爲然，但終於接受了蘇聯的意見。現雖由我國的外長王世杰發出了聲明，然事實上或許不容易有所變動。

中國何以會遭受這種公然的『侮辱』？值得中國自身切實反省，這是另一問題。但這次四強外長會議居然有這樣一種決議，其過度忽視中國的國際地位，可能於未來的整個世界局勢發生不良的影響，終不能不引爲遺憾！

假定我們對蘇聯懷有絲毫的惡意，則我們對莫洛托夫先生這次輕率的主張，將不會有任何難過，甚至連聲明也無須聲明；惟其我們願意和蘇聯作朋友；惟其我們希望蘇聯迅速完成戰後的重建與繁榮；惟其我們期待蘇聯成爲維繫世界和平尤其遠東局部和平的柱石；我們乃不能不盼望蘇聯在國際場合提出任何重大主張的時候應以謹慎的態度出之，尤其對於中國問題更非出以非常的謹慎不可。

自這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蘇聯週旋於國際壇坫的事實乃至爲頻繁，其地位也驟形重要，顧其態度有爲吾人最難理解的一點：即蘇聯隨時着重其自身的安全，又隨時不恤挑動全世界一種不必要的疑懼；隨時不顧其自身陷於孤立，又隨時在造成一脆弱的壁壘不恤以其自身爲之目標！

曩者希墨盛時，何嘗無其與國？亦何嘗無其主義與綱領？更何嘗沒有足以掀動一世人心的若干事實？即截至赫斯飛英以前，又何嘗不假定英美與蘇聯終無比肩與之爲敵的可能？至其軍備之堅強而充裕，吾人亦正不得因其爲戰敗國即並此事實而抹煞之。惟其自信也過深，斯其舉動乃益無所忌，曾幾

何時，形勢大變，卒歸顛覆，這種眼前的教訓，還不值得我們深長的思想嗎？

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並不是沒有相當的認識，甚至我們可以承認全世界了解中國最清楚的莫如日本。他們所了解中國的政治，腐敗；所了解中國的經濟，貧乏；所了解中國的軍備，脆弱；所了解中國的人心，分裂；總之無一够得上與日本為敵，這是事實。他們基於這種認識，乃至遇事予中國以難堪，隨處加中國以誣蔑，中國在國際場合隨時遭受日本的踐踏，則吾人更飽嘗之而莫可如何！可是等到一旦他們揭開了侵略的全貌，吾人的自信心乃日益加強，所自信的是什麼？信日本必敗，中國必勝！其所以能拖到八年以上而九死不悔，便完全靠這種自信心在那裏支持。可以說，日本之了解中國是近於科學的，中國之了解日本乃近於哲學的，判斷中國不堪一擊，並不完全違反科學；判斷日本終必崩敗，亦自有其哲學上的根據。

依照我們的常識，對世間一個強國不敢加以忽視，這是比較容易的；對一個弱而自有其強點的國家而不掉以輕心，則必須有較高的智慧。中國人對於蘇聯之力求了解，且這種求了解的心情是平恕而合理，這在中國的歷史上可以說是空前的。自然，我們承認：中國儘有年老的糊塗蟲，也有玩火的小孩子，可是他們在中國的地位並不重要，他們不正確的判斷和輕率的舉動，也可能引起若干不必要的誤會，但決不會影響中蘇基本的邦交。我們敢說：中國若干有地位有責任的中堅人物，他們對於中蘇關係的看法是大致不相遠的：他們認為真要奠定世界的和平，必須少數大國間的開誠合作，這裏面之不能缺少蘇聯，也猶之乎不能缺少中國是一樣。假定在為實現共同目標即世界永久和平的合作過程中，需要中國較高的忍讓，她是確能忍讓的；需要中國負責，她是確能盡其最善的努力的。我們敢說：最近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其所以迅速的得到成功，便完全是依於這種心情的一種產物。可是：我們對於『忍讓』兩字的解釋必得小心，千萬不要認為『無端的壓迫』和『無禮的被人看不起』也可以一併包括在內！

我們對於莫洛托夫先生代表他的祖國在四強外長會議中所主張擯絕中國不得與於『邀請國』的這一件事，僅僅只有一點感想：就是中國願意了解蘇聯，並且願意更進一步的了解蘇聯，而蘇聯對中國的了解，則尙嫌不足！中國當前的若干的景象誠然是太糟，可是她爲了換取世界的和平和人類的福祉，她將不惜繼續付出更大的代價，單憑這一點她是不會因爲對一時一事的快之感，便會失掉她堂堂大國的自信心的！世界有不少的精神病患者，過度的重視原子彈的威力，但在中國人的眼中有一威力更大於原子彈的東西，就是人類或國際必須相互依存相互尊重的公道或正誼！我們依據這一點來衡量中國應有的國際地位，我們的心情是很平靜，態度是很客觀的。

一切官辦，官辦不了

七月十五日

中國幾千年來都實行着官僚政治，上有一個君主，身爲行政首長，便由他任用一批文武百官，就將一國管理了，萬民統治了。並且這批文武百官大半由中央任命，分發全國；以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多，中央政府只須分發出去幾千個官吏，似乎就將國家事治理就緒了。——在明清之交，高明點的英法意德等國家的傳教士來到中國，一留心到中國的行政，他們都同樣佩服中國的官僚政治有辦法，一切由官辦，官又用得少，好像事情都辦了。

及到國民革命以後，尤其是抗戰這幾年以來，中國的官僚政治破了產，不但中國的老百姓抱怨起來，而且外國的觀察家也不再佩服了。中華民國的官，比較中華帝國時代，不知增加幾百幾千倍，但是事情大都辦得一團糟，而且貪污之風，勢不可遏，於是國民政府的聲譽不得不隨之而下降了！

中國的政治傳統，本是一切由官辦，何以到今天一切官辦，官辦不了，這是大可研究的問題。照筆者粗淺的研究所得，將問題略答如下。

原來，從前的政治原則主張的是無爲而治，要求的是清靜甯一，做官的愈管得少便愈好，所以玩一張琴，養一個白鶴，隱士派的縣長可以傳爲千古美談。但是現在政治則要求的是有爲而治，管得很多；不但要管，而且要教，要養，要衛，明白些說，不但要照料國家收錢糧和老百姓打官司，（從前的官，主要的只管這兩樣）而且連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讀書害病等事都要照料着，因此民國的官不得不比帝國增加到幾百幾千倍，而問題也就發生出來了！

第一、中國傳統的官僚政治既是主張無爲，則明明叫讀書人只去做官，不必做事，所以中國讀書人，尤其預備做官的讀書人，從來是不學習做事的，科舉時代如此，學校時代也如此。本不打算要做事，而且從不學習如何去做事，而今忽然要現代化的做起事來，並且事情又很繁雜，再加上科學化的管理法，由專家寫出一大套，讀書先生一看這一大套頭便痛了，還能够絲絲入扣照辦嗎！筆者敢說，以這幾年觀察所得，凡遇稍稍繁雜的政府法令，奉令的官，都沒有本領辦得了，辦得馬馬胡胡，不一團糟，已算難能而可貴了！

其次，中國傳統的官僚政治主張擺官架子，做事的本領可以不在乎，而做官的官派則須十足，不然便不成爲「做」官了。一個來自田間的小子，一旦做了官，他所有心思才力都用在這做官的「做」字上去了，不但這小子本人，而且他的太太，他的舅子老表，都專心去學着擺翅膀，淮王拔宅，雞犬升天！這樣子的官愈多，則必然的老百姓受不了，何況要他去管老百姓的經濟生活。譬如一個縣長可以集中幾十萬石糧食在他手裏，在他的十足官派的想法，這好像是我的一樣，都可以由我處分，只要上司瞞哄得過，老百姓又奈我何哉！——於是貪污之風便不可遏了！

復次，我們貴國要一下子便實現歐美先進國的現代行政方式，而將社會組織與民主監察兩樣事不加重視。我們號稱革命的政府，連社會組織也不容許老百姓自由的發展，也要由官辦；辦事的是官，而監察的也是官：遍地是官，官官相衛，中華民國簡直成爲中華官國，這個批評，不只因爲行政一切

由官，而最使人刺目的是社會團體也由官辦，監察官吏也由官辦！

近來行政上發生的不滿人意的問題太多了！輿論界職司批評，以供當局的反省，然而一件一件的批評，不勝其繁，只得概括的來說一說，一切官辦，官辦不了，其原因或者不外以上三點罷！

邱吉爾演說與法國的歧路

七月十八日

戰時英國首相邱吉爾，本年法國國慶紀念日，在梅資發表告法人的演說，是最近國際間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邱氏雖為在野之身，但因其個人聲望及保守黨再起執政的可能性，故平時言論已極為人所注意，況英國勞工和保守兩黨，所爭者祇在對內的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因係基於國家的利益，故相差並不很遠。往往在朝黨所不便講的話，邱氏以在野黨領袖的地位倒比較地可以放言無忌，與政府的實際政策互相配合，因此邱氏的一言一動，不止代表保守黨，往往與英國的整個國策有互相呼應之妙，其言論所以引人注意者在此。

邱氏在首相任內，向以保持英法親善，為最重要的任務。當英法聯軍慘敗之際，邱氏即發表聲明，主張英法成為合眾國，英國願以全力支持法國抗戰，雖當時法奸貝當等力主親德，不肯接受英國的好意，以致法國單獨投降，但邱氏對法國的高情隆誼，至今猶在法人記憶之中，這一次邱氏所以對法國發表演說，就是沾這一點便宜。

法國在戰後復興之初，本有三條路可走，第一條是獨立不倚於英蘇兩大之間，並且以自身為盟主，聯合西南歐拉丁國家，造成一個拉丁民族的西歐集團，這是戴高樂將軍一派人所主張的，可惜法國在戰後實力大受損傷，這個計畫雖好，無奈力不從心。第二條路是親蘇以拒英，與蘇聯羽翼下的東歐斯拉夫民族集團遙遙呼應，同時促動西班牙的反弗朗哥運動以造成歐洲大陸的聯合，將英美勢力排斥

於大陸以外，這是法國共產黨所主張的，社會黨也有一小部人傾向此點。第三條路是親英聯美，造成英法合作的西歐集團，以與斯拉夫民族的東歐集團相對抗，並防止德國的再起，此議英人最爲熱心，法國的人民共和黨和社會黨中的穩健派，未始不贊同此意，但時機尙未成熟，故不便公然喊出來，現在法國的出路是正徘徊於聯英聯蘇兩條路線之中。

以法蘇關係而論，兩國距離較遠，利害衝突較少，揆之遠交近攻之意，以及歷史上的俄法同盟舊誼，法蘇親善以共同防德，安定大陸，本屬合理之舉，況過去英國的大陸均勢政策專利用法國以打德國，法國人吃虧已經兩次，對英國的好意不免疑畏，過去貝當之所以甯可與德國合作，而不肯伸手向英者，亦即鑒於大陸的國家應該團結，不必再受島國利用之意，今日蘇聯比昔日聯德，更覺順理成章。但今日法國在大陸並無假想敵人，所急需的是取得經濟物資的援助，以促進復興工作。這種希望，只有美國才能滿足，蘇聯無能爲力。美英一體，聯美即非聯英不可。況蘇聯對法，又仍不脫對其他國家中操縱內政的舊作風，對法國的共產黨特別幫忙，前時時爲幫助法國共產黨在選舉中取得勝利起見，會特別以糧食接濟法國，這種作風實在傷及法國人的自尊心，未免弄巧成拙。況且蘇聯對戰敗後德國的政策，迄今猶在動搖不定，法國人深恐蘇聯爲對抗英美起見，扶植出一個強大統一的新德國出現，如果這樣，對法國大爲不利。這種種因素，都促成了法國對蘇政策的徘徊。在今日反共的人民共和黨領導法國政權之際，內政的對立，反映到對外政策上，其不能不比較傾向於英美採一致步調，是很自然的。

至於英國本身是一海權國，對於歐洲大陸必須扶植一次強的陸權國，以對抗最強的陸權國，乃是傳統的政策。在過去路易十四和拿破崙時代，法國最強，故英國聯普奧俄以對法，克里米戰爭以前，俄國最強，故聯法以對俄，克里米戰爭後，拿破崙第三的法國最強，故聯普扶義以對法，二十世紀以後，德國最強，故兩次歐戰均聯法俄以對德。此次戰後，德國一敗塗地，法國創痍未復，而蘇聯方憑

藉共產黨的國際勢力和斯拉夫民族的聯繫，到處與英美成爲對立的現象，爲英美計，欲在歐洲大陸上覓一陸軍大國，以共同對付蘇聯，實非拉緊法國不可，因此英法聯盟的呼聲，英國人比法國人實在熱烈得多。

爲法國計，與英美親交固無不可，但却沒有因聯英而反蘇之必要。西歐集團和英法聯盟之說，最足以引起蘇聯和斯拉夫國家的疑忌，最近捷克總統貝奈斯的代表東歐斯拉夫民族的發言，已可覘消息之一斑。法國若一味倒在英美懷中，蘇聯勢非扶助德國復興不可，這對於法國是最可怕的。法國之大利，在調和美蘇英三強間的衝突，穩定歐洲大陸，使德國無法再起。這就在乎法國領導國政的領袖們的眞知灼見了。

望政府貫徹保護人民的通令

七月十九日

這幾天之內，昆明接連發生李公樸聞一多被暗殺案二件。蔣主席聞訊後，極爲關懷，已手令電諭雲南省軍政當局，限於一星期內緝獲正兇，依法嚴辦。重慶行營兼代主任張羣，以雲南省在重慶行營管轄範圍以內，對此兩案亦至爲注意，已電雲南盧省主席暨霍警備總司令，着即嚴緝兇犯，依法懲辦，並將眞象澈底查明具報。同時行政院亦於十七日通電各省市政府，除對此兩案認爲「顯係奸人意圖以刺殺掀起社會秩序之不安」知照「已派警察總署署長唐縱，卽赴昆明督飭查緝兇犯，迅付審判，嚴予法辦，並對於負有治安責任之直接主管人員，查究責任，以憑懲處」而外，并嚴飭各省市政府，「對於一切人民之生命安全與自由，負有保護之責任，須飭屬嚴爲防範」。

關於昆明兩兇案的本身問題，在蔣主席的嚴令究辦之下，當有伸張法紀的一天。我們鑒於昆明兇案之一再發生，深恐飽經災難的中國人民今後之生命安全與自由，將更陷於無確實保障的境地，從而

加深社會的混亂，使政治愈無清明的希望。因此之故，對於行政院這一道加強保護人民生命安全與自由的電令，不禁寄與無限的同情和迫切的期待。

本來人民需要國家的基本原因，就是國家能保護人民的安全與自由。反過來說，即是政治學家加勒爾所言：『國家之本來的，初步的，直接的目的，是在維持組成國家的人民與人民之間的和平，秩序，安全，和正義。一個國家，如果不能把這些目的，達到相當的程度，便無存在的理由』。政府是行使國家職權的機構，人民擁護政府的起碼條件是政府能够代表國家，給予人民以安全和自由。如果一個政府并起碼的條件不能做到，則人民之對於政府，是必然由怨望而起反感的。

中國人民在三十五年來的內憂外患交相逼迫中過日子，安全早已成問題，自由更無從說起。過去之受壓迫摧殘於軍閥，於敵偽，且無論矣。自去年國家獲得空前的勝利，還我獨立的地位之後。人民誰不希冀從此即可逐漸享受安全和自由的幸福。但事實之所昭示，則與希冀相差甚遠。其住在中共控制下之解放區的人民，被解放得無生存無立足之餘地，相率而逃亡出來作難民，其住在政府統制下的人民，仍然受着貪官污吏流氓土匪的多方壓榨和種種法令的束縛，以言安全則朝不保夕，以言自由則動輒得咎。有心人聞見所及，早有一人問何世之感。

在昔專制時代，帝王雖視國家為私產，但賢明的君主亦必以保民為第一義。人民之對於君主，亦存着「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的觀念。在現代民主國家裏，政府更有保護人民的義務，人民更有要求政府保護的權利。今日當道諸顯要，多半自民主先進國留學歸來，當必深切了然於人民自由有切實保護之必要，所以纔因昆明兇案而重申政府保護人民的意旨，通電各省市主管官吏，加強保護人民之生命安全與自由。

行政院的這一道電令，應當貫徹，是絲毫沒有問題的。我們所要問的，是這一道電令，究竟能否貫徹？及其貫徹的程度如何？在中國顯然尚未統一和目前又入於激烈之內戰之情態下，要想這道電令

能够普遍而深切的貫徹，自然在事實上有許多困難的。但是只要行政院有決心，有氣魄，盡其最大最善的努力，於可能範圍以內，上承最高當局的意旨，下飭所屬官吏切實執行，還是可以發生極大效力的。如果只是把這一道電令當作應付昆明兇案的官樣文章，從發令之行政院本身起，已無勢必貫徹的誠意和決心，則奉令之省市政府即將以「遵即轉飭遵照辦理」之一紙呈復了事，絲毫無補於人民之生命安全與自由。所以我們認為這道電令貫徹之程度及範圍如何，還是次要的問題，最緊要的，是行政院要有貫徹命令的誠意和決心。而我們懇切希望政府拿出誠意和氣魄來，貫徹這道保護人民的通令。這是國家對人民應盡的起碼義務，也是人民應享的基本權利之一。

荷印獨立展望

七月二十日

住居西南太平洋，荷蘭所屬的東印度羣島，總面積約一百三十餘萬平方公里，其中較大的島有蘇門答臘，爪哇，西里白，婆羅洲南部。人口共計約有六千萬，其中華僑約一百餘萬人。物產豐富，石油，樹膠，蔗糖，錫等項，更是著名的。這些羣島要比荷蘭本國的面積約大四幾倍，人口則只大過八倍多。在荷蘭所有的各殖民地中，這塊地方算是最大，最肥美的了。荷蘭人統治這個地方至今，已有二百多年了。

當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荷蘭本土，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全被德軍侵佔，政府流亡到了倫敦，這個遠在太平洋的殖民地，多賴英國幫忙看守。因為在這個殖民地的荷蘭人：官吏，教員，商人，軍警等，總共不過五萬多人。等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荷印就為日軍佔領了。荷蘭政府為鼓勵荷印人民抗敵起見，嘗藉廣播發表將來對荷印的新政策，關於政治，經濟，教育，軍備各項，都立下了一種原則上的諾言。等到戰爭勝利，再來與荷印人民的領袖商討實施的步驟。這就是荷蘭在國難嚴重期中

向其殖民地發出的呼聲。但這裏邊究竟含有多少誠意，那就難以斷言了。去年九月日本投降，事實上，荷蘭沒有兵調到太平洋來，關於受降，收容敵俘等事，是由英國主持的東南亞盟軍統帥部担任的。久被壓抑的荷印民族獨立運動，也就乘這個機會爆發了。爪哇是荷印民族獨立運動的中心，所以在這個島上，曾與英軍，以及後來開到的少數荷軍，作過半年的流血鬥爭。今春荷蘭政府方與荷印共和政府的領袖們如蘇甘洛等正式接觸。五月間雙方才開始正式談判。但談判的進展到了甚麼程度，外間很少得到消息。依照荷蘭政府過去所作的諾言看來，荷蘭擬給荷印的是一種有限度的自治政治機構，尙談不到英國式的自治領，並且祇限於爪哇等幾個島，而不能包括全荷印羣島。荷印民族獨立運動者所爭的是整個印度尼西亞的解放。彼此的距離，是相當遠的。

不幸荷印獨立運動者本身，尙有許多弱點，亟待改善。其中最顯著的，是他們內部的意見不大一致，甚至領袖們之間，彼此傾軋。例如上月發生的荷印共和政府總理沙奇那，被某軍隊綁去，旋又釋放的事，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再則荷印各島上，還存留着一些蘇丹酋長之類的部落政治的傀儡。他們久受荷蘭統治者的懷柔，民族意識消沉，政治知識更是低落。加以教育落後，民間的文盲很多。因此對於民族復興運動的了解與擁護，是一時難望澈底和普遍的。現在巴達維亞的印度尼西亞共和政府，是一個臨時的組織，雖能代表多數人民的願望，然還不能控制全部羣島。這些都是爭取獨立自由的障礙，非及早設法排除不可的。

現當印度尼西亞的代表與荷蘭政府的談判陷於僵局的時候，荷蘭政府忽又召開一個「荷蘭帝國會議」。這個會議是本月十五日開幕的，地點是在西里白島的首府瑪林羅，由荷印總督穆克爵士任主席。出席的代表，包括全荷印的代表，但是爪哇及蘇門答臘兩個大島的不在內。這兩個大島的人口約五千萬，為共和政府所統治，所以出席的代表，祇能代表一千萬人。這個會議的目的，是想要在荷蘭帝國範圍以內，建立自治政府，以促進各島間的政治聯繫與經濟合作，以期恢復繁榮。這個就是荷蘭政

府對荷印放鬆少許政治控制，加強經濟控制的說明。穆克爵士說：荷蘭的目的，不再是命令，而是協助與合作。他又說：一個小國要担負重大責任，是有許多困難的，尤其是內部的地方主義，可使國土受到強隣的威脅的。這種一面安慰，一警告荷印人的話，用意所在，是不難推測的。

根據上列的事實看來，很顯明的，在政治上說，荷印已分裂成兩部了。一部份是由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所統治的兩個大島和五千萬人民；另一部份是西里白，婆羅洲南部及其他島嶼和一千萬人民，這一部份是不願立刻脫離荷蘭，而願自治以圖生存的。這裏邊的理由是不難推敲得到的。所不幸的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與荷蘭政府間的談判的僵局，尙有待於打開。這個談判，是要決定印度尼西亞人的命運的。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在生死關頭之際，雙方都在作殊死戰，這本是情理中的事。可是經過兩次大戰的世界，弱小民族被解放的，並不多見；而公理，正義，人道，和平等等美妙的名詞，則被人喊徹雲霄。結果都是口惠而實不至的。這就未免太不近情理了。未必國際間之所謂公理，正義，人道，和平，只是一種美麗的名詞，而並不是有色人等都能享有的東西嗎？

勉抑意氣，相忍爲國！

七月二十四日

政治本來是最複雜最煩雜的一件事，而民主政治的原則，就是相互尊重他方的地位和意見，需要以容忍和諒解爲基礎，尤其一絲一毫不可獨斷專行。中國雖未進於民主，但學習民主的態度，則不可不有。重感情，逞意氣，各走極端，置國事於不顧，是最要不得的。

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以來的一片祥和之氣，到今日已變爲遍地干戈了。我們很痛心這種以干戈代協商的方式。各國國民和國際同情的友人，也同樣痛心這種以干戈代協商的方式。但干戈畢竟已起，大家既不願長此坐視中國戰亂的蔓延，就不能不趕快想想辦法。雖不能戢干戈於未起之先，也應該努力

使戰亂縮短，趕快化干戈爲玉帛，化戾氣爲祥和。而這就是國共兩當事者以外的第三方面的人士和全國國民所應該急起直追的責任。

當前中國的政治問題，斷不能以干戈方式解決得下去。這種道理，不但全國國民都懂得，就是國共雙方的當事者又何嘗不曉得。但是曉得雖然曉得，而終於不能不走上干戈之途者，無他，不能抑制意氣感情的用事耳。從古國事，敗壞於小人者半，敗壞於君子者亦半。君子何以能敗壞國事？就因爲理智不能約束感情，而互逞意氣，各走極端之故。唐之牛李，宋之新舊，蜀洛，往事昭昭，載在史冊。今天的國共雙方領袖，以至於民主同盟的領袖，如羅隆基先生之流，我們可以說都是君子，都是誠心誠意想把國事弄好的，也都並不會拒絕和他人協商乃至合作。但匯集這許多君子於中國，何以國事尙不能順理成章和協下去，而必至於以干戈解決，這就不能說沒有一點意氣用事的成分在裏面了。

凡是意氣，不能祇怪一方面，事情總是相激相盪才成功的，回想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之日，會內會外的空氣，何等和洽，但因爲在開會期間有些方面，發言論事，仍未能盡平感情，協商問題，也未能真正披心置腹，以致協商雖有成就，而疑忌之心，彼此未戢，會後種種事端，愈激愈厲，俗語說：「微風起於蘋末」，一念意氣未除，今日干戈四起，凡對於國事負責任的各黨各派領袖，都應該痛切自省！

現在戰亂雖在發展，但和平之門並未關閉，不但馬歇爾特使和司徒雷登大使，正僕僕於廬山道上，就是周恩來先生也還未離南京上海。打既然決打不澈底，爲什麼不趕快想不打的辦法？我們以爲一面國共軍事會談應即刻恢復，並商定停止衝突的辦法；一面應請政府迅速公布李副案的真相，依法解決。同時各方面均須切實停止宣傳戰，相互尊重對方的人格，一切諷蔑之辭，懸揣之論，在發表前自己慎重考慮一下，庶幾意氣漸平，然後始能有補於國事，所謂相忍爲國是也。

正視強權政治時代 七月二十五日

從舊金山會議以來，這一年多的時間當中，國際局勢的演變，把一般人對於世界和平的信念以及戰後強權政治必然沒落的希冀，真是打得粉碎！世界依然是強權政治的世界，國與國間依然只有「力」的再平衡，沒有絲毫道理可講。

同樣地，這十個月來我們在國內所看到的，也無往而不是「力」的決賽，「力」的作用，一切取決於「力」！一班強有力者固然照例的口頭掛着和平合作的招牌，實則處處予弱者以無情的打擊；就是力量較小者亦有其一貫的作法，打得贏時便先打，打不贏時便高呼許多美麗的口號。同時對於力量不如己者，又自有一副盛氣凌人的面孔，絕無半點民主的氣味。這種道地的馬基維利式的作風，不僅普遍於政治界，而且早已波及到文化界。

一切正義，人道，和平，民主，本是一般無權無勇的人民所衷心蘄求的東西，強有力者似乎只有當地遇到更強者時才用得到，對於力量不如己者自然懶得理會了。然則那裏有正義人道？那裏有民主和平？

我們現在且撇開國內的現狀不談，先看看世界強權政治發展的新形勢是怎樣？而要瞭解當前世界的強權形勢，又必須追溯第一次大戰以來的幾件事實。

當上次大戰結束的那一年，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副會長馬金特教授發表「民主理想與現實」一書，這是一本有名的地緣政治的著作。他認為全地球面積四分之一的陸地，浮在四分之三的水面上，其中歐亞非三洲連續不斷的這塊大陸又佔了陸地的三分之二，馬氏稱之為「世界島」。美洲及澳洲，可算是外緣的島嶼。人類大部分的文明，都集中在世界島的兩個新月形的邊緣部分，即歐洲海岸地帶

和亞洲海岸地帶。在歐洲和亞洲的中間，他劃了一個大圓圈，包括蘇聯的大部分及伊朗高地，蒙古高地，中國的西部，阿富汗，俾路支，還有東歐的一部分，他稱之爲世界的「中心地帶」。於是他提出三個原則：（一）能控制東歐，即能控制中心地帶；（二）能控制中心地帶，即能控制世界島；（三）能控制世界島，即能控制全世界。馬氏這個學說，後來除第二點外，大多數的學者都同意：一個國家如果控制了東歐，她就可以進攻中心地帶和歐洲海岸地帶。

馬氏的學說，並不爲當時的英國人所注意，但却爲後來德國的地理學者所接受。希特勒上台以後的一切措置，以及二次大戰初期的種種勝利，主要的都是出於德國地理學者的策劃。但是後來希特勒又奉行盧森堡的人種學說，發動對蘇戰爭，他才踏上了失敗的道路。

現在希特勒是過去了，時代也由陸權進入空權，技術方面已經發明了原子炸彈，馬氏的學說似乎應該大大的修正了，但並沒有完全失掉它的作用。我們試看蘇聯自戰勝德國以後，在東方則進一步控制外蒙，伸足新疆，重佔旅順庫頁以出太平洋；在中東則企圖控制伊朗以出印度洋，控制達達尼爾以出地中海，在西方則控制整個中東歐和巴爾幹半島，又控制德北海港以出大西洋，都似乎是按照馬氏的說法，想澈底控制所謂「中心地帶」，完成希特勒未竟之業，俾可進而控制「世界島」以與新大陸的美國作世界爭霸的最後決賽。

在這美蘇爭霸世界的過程中，我們中國便天然成了兩大國家的競爭的目標，誰拉攏了中國，誰就是「天下三分有其二」。我們不要小視了中國的潛力，以中國之地大，物博，人衆，要是由美國人或蘇聯人來訓練一下，部署一下，這個力量是決不容輕視的。

我們明白了這個新強權政治的背景，即應了於於自己的責任及所以自處之道。我們不能做任何一個強權政治的貓腳爪，自貶國格，供人犧牲，我們應該發揮數千年來的立國智慧，在「國家至上」的原則之下，善爲應付，以至誠與人相處。在資本技術方面，今日任何國家都要乞助於美國，中國當然

亦不能例外。但這是出於建國的必要，出於自願，絕非與其他國家爲敵。

和平會議不久要開幕了，不用說，那是強權政治充分表現的機會，看看最近蘇聯反對中國爲和會邀請國之一，這是怎樣露骨的代表！我國對於參加和會的準備如何？計劃如何？陣容如何？我們應該明瞭那些問題是與自身有密切關係的，必須堅持到底，誓死力爭，雖退出和會或拒絕簽字，亦在所不惜，這是對付強權外交的基本態度。至於那些與自身關係不多的問題，則不妨少作主張。

爲了應付方與未艾的世界強權政治，我們裝着不見是不行的，我們必須把眼光從內部移到世界舞台上，我們要正視強權政治！到那裏去顯顯身手吧，不要儘着在自家兄弟姊妹身上出氣！只有放棄小強權政治，做到真正的內部團結，然後才能應付世界的大強權政治！

值得注意的兩件事 七月二十七日

本月十九日晚間，東京澀谷警察所門前，發生日警鎗擊台灣僑胞事件，台胞死者四人，重傷者二十人，被捕二十七人，日警受傷者二人。肇事的原因，是因日本警察取締澀谷及新橋兩區的攤販而起的。在這個地方的攤販，多數是我台胞和一些朝鮮人，此外就是日本人。

對於這個慘案，中國駐日本的代表團發表了一個聲明。其中說到自美國佔領軍抵日本後，東京台胞爲謀生計，曾向某日本公司租得在新橋的大片地區，經營攤販，近該公司忽要求自本月三日起停租，台胞多番與之磋商，不得要領，該公司竟用暴力驅逐台胞攤販，糾集數千日本浪人，於本月十九日發動大規模之毆鬥，台胞乃集合數百人自衛。中國駐東京領事館多次努力，將台胞疏散，不料此等被疏散的台胞，經過日本警察所時，竟遭日警開鎗射擊，死四人，重傷二十人。這是中國官方的說法。日本警察方面，則誣指我台胞爲反抗警察取締攤販，企圖糾衆圍攻澀谷警察所。說是台胞約三百人

，分乘卡車若干輛，行經該警所時，不遵令停車受檢查。首先開鎗向該所長射擊。並且張大其詞的說：「台僑約一千人來自大坂，神戶，名古屋，援助在東京因反抗取締黑市而被捕的許多台僑」。總之，這件事的發生，並不是偶然的了。

本月二十日，巴西的聖保羅省發生了一件日本僑民大鬧省長公署的事情。緣自去秋日本投降後，居留巴西的日本僑民，多不承認日本戰敗。這種不可理喻的情形，尤以在聖保羅的日僑，表現得最爲激烈。他們會要求巴西政府檢查報紙，以免登載日本戰敗的消息，因爲「這是刺激日本人的」，並且在日僑中，因此常發生暗殺事件，已經死了三十餘人。本月二十日，聖保羅省長召集日僑中的許多領袖，在省長公署開會，討論防止日僑的恐怖行爲的辦法。他們竟向這位省長說：「每個日本人在他的國家永遠強大的信念中長成的，不承認他的國家是戰敗了的」。接着這些日僑就在省長公署裏邊大鬥大打起來了。結果，省長祇得叫警察來將他們趕出衙門。

台灣自甲午中日戰後，被日本奪去，統治了五十年，去秋日本投降，方回到祖國的懷抱裏來。台灣人由日本屬地的人民恢復了中國國籍。中國政府要負起保護海外台胞的責任，當然是一件毫無疑義的事，尤其是對於旅居日本的台胞，更要特別加以愛護。因爲在日本人的眼中，台灣人曾經當過亡國奴，因日本戰敗了，台胞又變成了中國人，在日本人的心中，更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所以日本人對於台灣人仍要遇事摧殘，不留餘地的，絕不會因爲台灣人就是中國人這一點關係，可以改變他們的觀念的，因爲他們根本就着中國人不起的。這種牢不可破的心理，決不會因戰爭的勝敗而能有所改變，反之，或者還有加强的可能。這個就是日本民族性的一方面。中國人應當隨時警覺，日本這個隣人是不可易相處的。過去的關係既然惡劣，將來總希望能夠改善幾分，但這個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國人更應當自省，自勵。

在巴西聖保羅發生的那一件事，中國人切不要以爲那是遠在南美洲，而就漠不關心，更不要以爲

那些遠瀛海外的日僑蠻不講理，自欺，欺人，日本投降至今快到一年了，難道他們不知道嗎？而他們竟不承認日本戰敗，始而干涉住在國的言論，終而大鬧省長公署，中間還發生過暗殺的恐怖，這個顯然是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弄得身爲主人的巴西政府大有難於應付之苦。這個豈能作爲一件簡單事情看嗎？在異鄉作客的日本人，何以竟會如此胆大妄爲呢？這就是一般日本人心理的反映，這就是問題嚴重性的所在。一個民族心理的養成，是由來已久的事。想要改變一個民族的心理，是一件十分困難，需時最久的事，並不是經過一次敗仗就能奏效的，何況日本人還是一個最富於迷信思想的民族，加以受了千多年的愚民教育的結果，由生活環境而形成的心理，也就變成日本人的天性之一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句俗語，拿來形容日本人的心理，可以說是很恰當的了。

去秋日本投降，盟軍統帥能够利用天皇頒佈勅令，使各地日軍投降繳械，使日本人民接受因戰敗而投降的事實，至今盟國佔領軍仍不願將天皇列入戰爭罪犯，雖然明知他是罪魁禍首，因爲依據過去日本的憲法，天皇是要負責任的。這是在使佔領軍的政策以及一切措施易於執行。這本不失爲一種聰明的舉措。因爲日本人素認天皇爲人神一體的至尊，故能對天皇盲目的崇拜，絕對的服從。試看這次日本投降，散在中國和南洋各地的日軍俯首繳械，盟國佔領軍登陸日本本土，日人不但沒有反抗的行爲，而且表現得秩序井然。凡被盟軍認爲應負戰爭責任的文武官吏，都規規矩矩在東京受國際法庭的審判。這正是日本民族沉澱的表現。日本認爲這一次他們之所以失敗，是科學落後，武器不如人；並非由於日本人不能作戰的原故。這也就可以說明日本人不承認打了敗仗的錯誤觀念的由來了。這是一種可怕的心理。這種心理如果長久存在，來日大禍是難免的。這一點不特中國人要明瞭，記着，尤其是歐美友人更要明瞭，記着；記着日本人貌似恭順，心懷鬼胎！

團結，復興！ 七月二十八日

——巴黎和會前夕中國應有的努力——

自從司徒大使到牯嶺遞國書以後，便有一種傳說，說在最近，政局將有重要發展。但是等了許久，並沒有任何消息發表。最近中共代表周恩來返京後，曾與馬歇爾特使交換意見，馬帥已於前日冒雨飛牯嶺，司徒大使亦於昨晨飛牯，一般人對政治僵局的打開，又抱着殷切的希望。

但據司徒大使臨行時的談話，則國共雙方距離仍不近，中共的態度仍未變，主張立即無條件停戰。我們知道，政府所主張的，是要先解決恢復交通問題，軍隊整編及駐地問題，然後再談其他。過去談了許久，都沒有結果，於是談判陷於停頓，軍事衝突，又變本加厲了。

在這期間，因為戰亂的範圍日益擴大，英美蘇的輿論，對中國局勢，非常關切。尤以二十二日莫斯科電台的廣播，最為露骨，說蘇聯已不能熟視無睹，主張實施去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的決議。那個決議說：「三國外長對於中國局勢會交換意見，彼此同意，在國民政府治下有一個統一而民主的中國，各派民主份子，廣泛參加國民政府各部門，並停止內戰，均屬必要。余等重申固守不干涉中國內政之政策。」

不僅我們的近鄰蘇聯非常焦慮，就是英國向來保持緘默的，現在也非常關切了。二十四日曼哲斯特導報的社評，也發出懇切的呼籲，他說：「中國的資源，並不是取之不竭的。種種跡象，已顯示中國不能再維持這無意義而且糜費的內戰。從戰後復興說，經濟局勢，較前更為惡劣，通貨膨脹繼續猖獗，工業區普遍失業，許多省內發生農民暴動和劫米情事，中國還沒有恢復她自己的貿易，更不能在遠東趕上日本的貿易了」。二十五日倫敦泰晤士報社論說：「中國如欲組織真正全國性之軍隊，確保

國內外安全，則兩個交戰軍隊雙方必須有一方屈服，此則非經過重大試驗後難以實現」。二十五日工黨的新聞記事報，說得更露骨：「中國的內戰，雖然在離英國幾千哩外的地方發生，可是他已逐漸成爲國際重要性的問題。對於中國內戰，西方民主國家與蘇聯集團意見的歧異，引起一般視線的集中，較巴黎議席上所討論的任何爭執問題，還要來得厲害。世界人士，對顯然危害世界和平的事件，不能再延遲加以考慮了」。

美國的輿論，現在依然是分歧的。有主張請國務院再勿促使中國政府對中共讓步的；有主張停運一切軍火來華，撤退美軍，並召回馬帥的。但是美國却沒有人認爲中國內戰會促成美蘇戰爭。羅斯福總統夫人最近評論宋慶齡女士的言論，就是一例。她說：「沒有人能夠違反我們的意志，迫使我們對蘇作戰」。她又說：「爲世界安甯計，中國交戰雙方，應該尋覓一個途徑，共同合作」。二十六日上海大美晚報以「中國也有責任」爲題，也對中國朋友提出一種善意的忠告。他說：「我們過去只聽見說，世界各國對中國有許多責任，從救災到斡旋和平。但爲中國自尊計，我們也應反問中國，對世界各國，中國也有許多責任。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國家經濟破產，不能不大大影響其他一切國家的經濟。中國不獨未能迅速的發展，成爲一個生產力與消費力增高的國家，反而變成一個出口毫無而輸入則大部分惟恩物與借款是賴的國家了。此種不平衡的畸形現象，影響之大，將延遲各國的經濟復興。」

所以現在也有許多英國商人，要求英政府出任調人，來調解國共糾紛。但英政府不願再轉入遠東漩渦，已拒絕了這個要求。英國輿論現在打破了向來的緘默，也不外希望中國和平早日回復，以便英人好早一點恢復其遠東市場。

中國從九一八到現在，經過了十五年的國難，從七七到勝利，也經過了八年的苦戰，從勝利到現在，又打了幾乎一年的內戰，光榮的勝利，打成了砲灰，崇高的國際地位，打得一落千丈，經濟破產

，民不聊生，再不能不休養生息了。這次巴黎和會，改造歐洲版圖，重建歐洲和平，中國爲主席團之一，我們應該自重自愛，團結一致，努力復興，以中國的和平建設，鞏固戰後世界的和平，促世界經濟的復興，才算盡了聯合國應盡的責任。中國在巴黎和會前夕，應該有一個新的姿態出現，以一新世人耳目而增高國際地位。

國共雙方，爲了人民幸福，國家榮譽，和世界安甯，都應該在軍事與政治上同時作重大的讓步，自動的提早實現海內外同胞一致的要求，軍隊國家化和政治民主化。中國必須成爲一個統一和民主，強盛與繁榮的國家，與英美蘇法敦睦邦交，共維戰後世界和平，才不辜負過去八年的慘痛犧牲，和爲國捐軀的抗戰先烈。

應從尊重人民做起

七月二十九日

現在戰爭沒有停，而且一天天趨於激烈，可是談判的姿態依然存在，馬周見面以後，馬帥和司徒大使又已飛往廬山。

我們要問的，便是這種國共直接由美國居間的談判，到底會不會有成就？

依據我們的經驗來判斷，是不會有成的。去年毛澤東氏親到重慶，與蔣主席直接商談，其所提出的要求，不外保留若干軍隊，保留若干地方，經過十來天討價還價的磋磨，到底一無成就。於是由於各方詰責，不得已才回到多方面共同商討的路上來，好容易才有所謂政治協商會議出現。假定第三者在政協的態度，能確保中立的立場，一切以人民的利害爲利害，是確能有所成就的。但不幸由於一部分人的態度錯誤，一定要偏在一方，假藉辨別是非的美名，以自毀中立的壁壘，使疑懼者更加疑懼，驕蹇者更加驕蹇，於是相磨相盪，乃有一串的不幸事件和誤解發生，使政協的五次決議陷於若存若亡

，而使國共依舊返於直接談判的故態。

在最近這次國共直接談判中，雙方更是赤裸裸的毫無顧忌，除討價還價專談軍隊與地方以外，更不能發現任何有關人民本身的議題，價錢既然講不好，當然便只有打起來！而所謂第三者，除掉遊行，請願，救死，扶傷以外，乃至求一正式發言的機會而不可得。談中國政治而要抄襲外國的皮毛，對着拿了鎗桿瞄準待發的兩方，而高談是非理論，其愚昧荒謬，真是不可救藥！

無論國共私和或國共私鬥，站在人民的立場看來，都是一種恥辱，因為軍隊只能屬於國家，地方也只能屬於國家，既不是國民黨可以私授，也不是共產黨可以私受，私相授受便是不民主之尤！便是心目中無人民存在！

自然，就是有各黨各派及社會賢達共同參加的政協會議，也不見得真能代表人民，可是方面既多，最低限度大家總多少還要顧顧面子，在協商的過程中，人民總還多少有一點機會，可以大致知道談判的內容究竟是一些什麼，這便多少還有點民主的意味。否則國共儘管直接商談，可是要由直接商談回復到二十年前的國共單獨合作，終為事實上所不可能，將來仍非聯合各方不可。既是將來仍非聯合不可，何如在現在就為將來的聯合造成一個良好的基礎呢？

現在的蘇北戰爭，兩方面雖然都在調兵遣將，可是其目的并不在以打解決問題，在中共不過要藉強烈的抵抗，以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國民黨也不過想以優勢的武力，強制共產黨多從政治上讓步，其歸結仍不外妥協一途，所苦者只是多數人民而已，又為什麼不提早回頭呢？

老實說：要和平，要統一，要民主，這確實是人民的公意，國共兩黨也僅僅只有這一條路可以走得通。大家如果不從尊重人民做起，我們相信會越走越遠，彼此所共同要達到的目的，終於不能達到。萬一不幸，因中國的內戰延長，果然引起國際的共同干涉，則八年抗戰的全功，可以廢於一旦，無論國共的任何一方，對人民都不能不負嚴重的責任啊！

祝巴黎和會成功 七月三十日

歐洲和會昨天正式開幕了。這次巴黎和會，在德國投降後十四個月才正式開會，一是鑑於上次和會開得太快，所以這次才先開外長會議，二是因為英美與蘇聯的意見不調，使外長會議一再議而不決，因此使和會遲到現在才召開。

貝爾納斯在和會前夕，曾發表聲明，說美國要竭力重建世界和平，並以歐洲為起點，決不恢復孤立主義。這個聲明，我們不要忽視，他是兩次大戰，血的教訓之結果。美國朋友，現在纔真正感覺歐洲的重要了。歐洲有鞏固的和平，世界才有永久的和平；歐洲恢復了繁榮，世界才能復興。所以過去對軸心集團作戰，採取歐洲第一的戰略；現在發動和平攻勢——重建世界和平的努力——又是採的歐洲第一的戰略。

中國在兩次大戰中，遭受強隣日本的蹂躪和侵略，尤以這一次的浩劫為史無前例的，也是受了歐洲的影響。中國人的「歐洲感」，是應該同美國人一樣敏銳的。

美國地理學家罕廷頓曾云：「西歐和中歐的精華區域，已成爲文化的大中心，爲時達一千年之久，是新思想的搖籃，是世界偉人的故鄉，是世界商品的總工廠」。就政治，經濟，文化，風俗言，歐洲對世界的影響，都是非常深刻的。

在上次大戰後，一般人均以爲，不久太平洋將變爲國際政治重心的中心點，而與歐洲爭衡，尤以英帝國的自治領和北美合衆國的人士，多抱此種觀點。那種期望，並未會實現。歐洲依然是全球的經濟樞紐。印度和中國的人口，誠然很多，北美合衆國的資源，誠然很富，但是歐洲大陸國家對海外世界的需求，仍然是最關重要的。因此，惟有歐洲大陸國家的繁榮，才能促成世界的繁榮。在歐洲經濟

最困難的時候，所推銷的英國貨物，仍比世界上任何部分為多。例如：一九三五年英國貨輸入中日兩國者，共計不及一千萬英鎊，而輸入歐洲者則超過一萬萬四千萬英鎊，即就澳洲言，中日兩國由澳購貨雖多，但東亞市場對於澳洲，並不及西北歐（大不列顛除外）市場的重要。所以美國現在對歐政策，也是門戶開放主義。因此英美才不惜以重大代價與蘇聯妥協，以便重建歐洲和平。法國人民共和黨也不惜以重大讓步，妥協共產黨，組成舉國一致的內閣，以便由協和內部，再進一步做到協和歐洲。歐洲的和平，不僅關係歐洲本身，而且影響全世界，所以我們不應以為，這次巴黎和會所討論的問題，與中國漠不相關，而加以漠視。我們從歐洲政治舞台的鬥爭就可看出戰後世界政治的趨勢，及今後中國所應採的內政和外交政策。

戰後歐洲各國，無論戰勝或戰敗的國家，顯然分裂成兩個營盤，在西歐的比較接近英美，在東歐的比較接近蘇聯。而英美與蘇聯的關係，又非常微妙，這是歐洲和平所以不易及早恢復的主因。同時在亞洲也有一種相似的形態，所以遠東的和平，一時也不易回復。

這次巴黎和會所討論的問題，只是對義，羅，保，匈，芬五國的和約問題，而德奧問題並不在內。所以即令這次和會成功，所解決的問題祇是次要的，主題還待外長會議繼續協商。義大利與南斯拉夫為特港問題，發生嚴重糾紛，雖經法國從中調處，提議國際化，但相爭兩造並未同意接受，這次和會開幕後，必有一番激烈爭辯戰無疑。保加利亞的祖國陣線領袖米特羅夫夫對反對黨摧殘不遺餘力，只因美國代表巴納斯的抗議而略見和緩，因為保加利亞急需美國的經濟援助，故不能不尊重巴納斯的意見。據說，莫斯科曾經再度敦促保政府驅逐巴納斯出境，保政府再度加以拒絕後，第米特羅夫夫立即被召往莫斯科，受嚴厲申斥。因此在其他問題上，索非亞就比較聽命於第三羅馬了。保國放棄對南國的領土要求，讓蘇聯完成一個統一的衛星家庭，而聯合其他巴爾幹國家，一致對希臘索取領土，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總之，今日歐洲的問題，必須獲得三強的同意，始能解決，但是完全由三巨頭處決一切，而置各小國的利益於不顧，則這種狄克推多的和平，也是不能維持於永久的。所以我們極端贊成王外長的主張，歐洲和約，應本國際正義的原則，及民族自決的精神來擬訂；貝爾納斯所呼籲的公正的和平，亦即此意。

據說，在這次和會後，外長會議將繼續舉行，以便考慮對德奧和約的問題。德奧問題不解決，歐洲和平，是沒有保障的。上次巴黎外長會議，曾經討論到德奧問題，但並無結果。法國主張使魯爾脫離德國，以免德國經濟復興而重整軍備。蘇聯一方主張保持德國的統一，但未反對合併英法蘇的四個各自為政的德國佔領區；一方宣傳蘇德是傳統友邦，贊成建立中央集權的統一德國政府，反對英美所主張的聯邦制，但是又強迫德人為蘇聯作苦工，並要求德國償付賠款一百萬萬美元。英美抗議在奧國減少駐軍，蘇聯既不贊同，建議成立民主政府，與各國自由通商，亦不同意。這些鬥爭，都是歐洲列強爭霸戰的故技。過去俾斯麥會云：「誰是中歐的主人，誰就是歐洲的盟主。」誰是歐洲的盟主，誰就是世界的霸主了。今日歐洲的和平，還是一個均勢的和平，是一個武裝的和平，而且這個均勢，正在掙扎與動盪之中。我們看了蘇聯在歐洲各國及他處的駐軍分配額，就可知道這個均勢正在遭受嚴重的測驗之中了。

據紐約時報軍事記者鮑爾溫的估計，紅軍現在留駐歐洲及外國者，計達兩百萬人以上，其分配大致如下：一、德國，七十萬人；二、羅馬尼亞，三十九萬人；三、波蘭，三十二萬五千人；四、匈牙利，二十六萬人；五、朝鮮，二十萬人；六、保加利亞，十五萬人；七、奧國，十五萬人；八、捷克，南斯拉夫及伊朗，約一萬人。

這種大批的駐軍，不早日撤退，則戰後歐洲的和平與民主，便無由重建。不獨紅軍未曾完全復員，就是紅色輿論也未會停止不必要的宣傳戰，在納粹侵蘇五週年紀念時，蘇聯主筆均讚揚「紅軍為世

界最強而有力之軍隊，紅軍的重要新任務，爲保衛蘇聯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十字軍」。蘇聯史學家塔爾來並在紅星報撰文，說：「美國反動派正陰謀發動法西斯十字軍，首先摧毀美國勞動階級，以便把『亞美利加式的和平』，強迫加諸世界」。

我們認爲這種神經戰，是不必要的。他只足以製造國際間互相猜疑的心理，阻礙和平合作的進展，對於蘇聯及其親近的友邦，亦並無利益，保加利亞的態度，和法共與奧共之並不支持蘇聯的主張，便是一個最好教訓。

我們希望這次大小列強，本着民主自由的精神，依據大西洋及聯合國憲章的原則，開誠佈公，互信互讓，草擬一個合乎正義與公道的和約，爲世界和平奠立一個鞏固的基礎。

公是與公非

七月三十一日

現實的政治和理想的政治，從來是不大合得攏的。從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一部人類政治史，不外是力與力的關係，有力者勝，無力者敗，力多者強，力少者弱，力與力相持而不下，然後始有均衡，始有折衷，實際的政治，不外就是從各種複雜錯綜的關係中，找出一個均衡點來使整個局面穩定一下。現在巴黎正在召開的二十一國和平會議，所作的就是這一點功夫。舜的「執兩用中」，所謂「中」也就不外是力的均衡點。找出這個均衡點來，所謂事物才能攔得平。這裏面赤裸裸地是力的關係，只有均衡，只有中與不中，無所謂是非曲直。

但理想主義的政治家們，是不甘心於這種現實觀點的。人類之所以進化，就在乎以理性來控制自然，乃至人類本身。理性控制自然的工作，到今天原子能時代，已着着成功。但理性控制人類本身，特別是關係人類最大的政治行爲時，却不免有點力不從心。從威爾遜的十四條，到羅邱的大西洋憲章

，一貫是理想主義失敗於現實的慘史。但理想主義者，並不因此灰心。究竟理想主義，並不是毫無成就。古來的有力者，祇要說一句「臥榻之旁，豈能容人鼾睡」？就打起來了。今天的有力者，無論是國際或者國內，儘管時時備戰，時時要戰，時時在戰，滿口却都是和平，人道，「我並不想戰呀，是他先開火，我才不能不採取自衛行動呀！」這就是證明有力者雖有力，還不能不多少顧忌一點公理。理想主義前途的尚可樂觀，就在這一點上。

既要講理，就不能不有是非，因此談政治而辨是非，雖未免有點迂闊，並不是不可以的，也並非與執中之說相抵觸。因為一個是就現實的觀點來看，一個是就理想的觀點來看，兩者原可並行不悖的。所要問的，是所謂是非，究竟是人心之公的公是非呢？抑還是少數人偏執之見的私是非呢？這倒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什麼叫做私是非？譬如在抗戰期間，有些漢奸明明是賣國求榮，却滿口和平救國，曲線救國，直到如今身敗名裂，還靦顏以地下工作自解。這種是非，就是邪是非，私是非，我們決不容許有這種歪曲事理的是非，也決不容許這些漢奸以是非自解。但是這一類的歪曲是非，是很難絕跡的。譬如，在從前，明明日本人是割裂我們的土地，分化我們的統一，掠奪我們的物資，混淆我們的思想，而美國人既不會佔據我們任何土地，還歸還我們以台灣，也不會掠奪我們任何的物資，還供給我們以租借物資，是非之明，如此顯著，但有歪曲的論者，偏偏要發為排美之論，而對於割裂我土地，掠奪我物資的野心強隣，偏偏不置一辭，甚或還引為良友；這就是少數人的私是非，邪是非，不足以語於人心之公。又如張獻忠，李自成之流，明明是殺人不眨眼的流寇，有些歪曲學者，却捧為農民革命的英雄，大唱其「神皇躍馬起延綏」之論；這也是邪是非，私是非，不足以語於人心之公。因此要談是非，就必須先建立是非的客觀標準，否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越談是非，是非越不明；這就成了平劇上所說的：「你不說我還明白，你越說我倒越胡塗了」。

今天中國的政治上要找是非標準並不難，最低限度，可以有兩個標準。第一個標準，是國家的權益。凡是有裨於國家權益的就是「是」，凡是違反國家權益的就是「非」；凡友邦行爲是在精神上物質上幫助我們強大統一的，就是好朋友，凡蓄意分化我們，割裂我們，掠奪我們的就不是好朋友。除了少數抱有歪曲成見的人以外，全中國的人，都可以擁護這個理論。第二個標準，是人民的權益，凡尊重人民的生命，財產，思想，立場，集會，結社等一切權利的，就是「是」；凡剝奪人民這些權利的就是「非」。如果有兩個政權，同時都不尊重人民的權利，那就應該比較一下，那一個剝奪人民的自由，迫害人民的生命財產，強姦人民的意見更利害一些的，其「非」更大。要談是非，就應該如此談。這個道理，除了少數抱有歪曲成見的人以外，也一定能獲得全中國人一致的擁護。

我們不要說，中國人民，沒有判斷是非曲直的能力；更不要說，是非曲直，可以讓少數有成見的人，任意歪曲；我們須知道：公理表面上雖似屈於實力，但天長日久，公理終是最後的戰勝者。民國三十五年來，有多少依附侵略國爲背景的政治集團，如安福系之流倒了，有多少殘賊民意的政治力量，如北洋系軍閥之流倒了。人心不死，公理常存。談是非者，要注意由人民心理所反映的公是公非才好！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9678B



~~0842~~
海 蔦 書 店
行 館 上 册
冊 數
售 價 0.50